话说阿三

金唢呐

我看阿三不顺眼已经很久了

上个帖子我谈到了愤愤为什么不去惹印度阿三，有网友对这个问题表示出兴趣。其实，"我看阿三不顺眼已经很久了"（好像是周星驰的语言吧，请小青年指正），倒不光是阿三沾了我们多少便宜，"吃亏事小，失节事大"，关键是我们以前吃洋人的亏，都是因为我们武器不行，是因为我们弱；按孙雷网友的说法，就是国人普遍认为"西方战争讲究武器，中国战争讲究谋略"，"西方文明注重物质，中国文明注重精神"，本来就不是一个路数，咱们讲究的是斗智，鬼子玩的是斗勇，所以无论西洋先生怎样打中国学生，总还能找点心理安慰。

而和印度较量，硬件我们完全占上风。当今国人谁会看得上那个我们眼中脏兮兮、傻乎乎、穷不拉几的劣等民族？阿三在我们眼中最多也就是小 D，连王胡都算不上。但令人不能理解的，就是和这么个我们眼中的小 D 较量，我们却还吃了亏，而且是吃了大亏，而且还是不止一次吃亏，这不能说敌人太狡猾，只能说是因为我们蠢，这真是我们这个以研习《三十六计》为时尚民族的奇耻大辱。更不能容忍的是，我们吃亏还都是毛主席健在的时候，他老人家可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谋略大师，至今还受全国人民的顶礼膜拜。一想到这里，我就死活咽不下这口气。吃亏不要紧，关键是咱丢不起这个人。

感情归感情，有时候想想这些事情，再看着我身边的印度人，开始还自觉高阿三一等，待到这些事情想多了，竟然也有了鲁迅坐黄包车的感觉："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此处指阿三）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鲁迅《一件小事》）。再想的多一点，最后也多少明白了些要小聪明、抖小机灵的"小"和玩大智慧的"大"之间的差别。

为此，我做过点"跟踪研究"，想看看阿三到底搞了些什么名堂，竟然使自己也有了鲁迅坐黄包车的感觉，结果真的发现人家确确实实干了几件漂亮的活计，确确实实能把我们"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我看阿三不顺眼已经很久了"，还因为早在一百多年前，英美租界的印度人就让阿拉上海人吃足苦头，特别是那些摊贩、车夫、苦力、乞丐、难民。过去中国有句话：东北有棒子，上海有阿三。意思是说在东北，日本人用了不少朝鲜族的人做低级警察，相当于现在的治安联防队员，因为日本人拿他们也不当自己人，所以并不对其进行武装配备，只给每人发一木棒，名曰警棒或警棍。这些朝鲜人助纣为虐，动不动就挥舞着木棒帮敲打俺们那疙瘩东北银，故称高丽棒子。上海英国租界则是雇了不少印度人当打手，主要是当巡捕和看大门，也没少欺负上海人，故上海人送绰号

印度阿三。其实法租界在这方面做法与英租界大致相同，他们用的是安南巡捕，即越南人，在上海人看来，其体态、皮肤与广东人相近，所以没送他们什么绰号或代称，也没有人称安南巡捕为越南阿四，只是简称他们为"安捕"。因为越南阿哥实在太像了两广那一带的人了，而且粤语发音听上去和越语差不多，丝毫不比越南话好懂，至少在我听来都跟外语一样。

阿三进入中国，还要追溯到 19 世纪中叶英国在上海开设巡捕房。维护租界的社会治安，起先金发碧眼的西捕还能应付，后来刑案随人口激增而水涨船高，由清一色的西捕办案，弊端逐渐突出。按照专家的说法，是由于"西捕有种种局限，比如微服侦察，其相貌特征根本无法掩饰；又比如去公共场所打听，其语言障碍造成的困难也难以克服；再加上租界里有帮会组织，西捕由于种种原因很难深入进去，也物色不到合适的人选做耳目，破案效率不高，租界治安堪忧。"所以请来了印度人。

依我看语言障碍、国情不熟根本不是理由，英国人担任巡捕的种种弊端在印度人同样存在。我考虑可能是英国巡捕薪金高，还得有什么失业保险、受伤补偿问题，成本太高。另外就是英国佬以绅士、贵族形象示人，讲究的是文明礼貌。若动粗，一定会被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质问"人权的双重标准"。但租界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根本离不开皮靴警棍。现在也是一样，城管虽然凶煞，但不这么动粗根本镇不住小商贩和私搭乱建，这也是实际问题。

鉴于以上情况，英国佬从 1870 年后改为允许华人充任巡捕，称为华捕。由于这一改变收效明显，也给大量国人创造了就业机会，入行的越来越多，以致渐而主次倒置，即西捕大减、华捕大增。例如 1883 年英美公共租界有巡捕 200 名，华捕竟占 170 名之多。以后，华捕越雇越多，殖民者怕华捕私下玩猫腻，不易控制，1884 年开始从英殖民地"进口"印度籍巡捕，即"红头阿三"。以后越来越多，成了上海滩一景，也深深刺痛了中国人的自尊心。蒋光慈在《少年飘泊者》这样写道："我在街上一见着红头阿三手里的哭丧棒，总感觉得上面萃集着印度的悲哀与中国的羞辱。"。鲁迅也这样写过："事后，还要挑选瑶民代表到外埠来观光，叫他们看看上国的文化，例如马路上，红头阿三的威武之类。"（《伪自由书•王化》）。

现在回过头来看，英国佬这么干也有它的道理，若由华捕管理租界，要么迟早会成为青红帮的天下，成了上海滩藏污纳垢、走私贩毒的"码头"；要么就是我党开创的红色根据地，租界之火可以燎原，迟早会爆发起义暴动。我听过不少桑海宁（上海人）骂印度阿三，也看过写印度阿三的文章，但大都是控诉阿三动粗的、野蛮执法的，揭露阿三走私受贿的很少。另一方面，阿三也让我党的发展工作受阻，即使是最善于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周恩来，在上海蹲了那么长时间，也没在阿三中发展什么党员，歌颂阿三掩护我党地下工作者的文章我也没看到过。

殖民者从印度向中国"出口"巡捕时，对人员精心挑选，要求是印度的锡克族人，个个身高马大，满脸虬须，一身横肉，令身材相对矮小的南方人望而生畏。"阿三"大多充当巡警、狱警与交通警。除此之外，还有"看门"也是他们的专业，凡属公共租界内的大公馆、大商号、大栈房、大娱乐场以及各级衙门的大门口，都有一个又高又大的"红头阿三"站着。大门口有了"红头阿三"便显得威武雄壮，神气活现，能够吓退乡下人和小瘪三，拒绝一切主人所不愿接见的朋友。并且主人认为这是一件高贵

装饰品，说明主人用上了进口货。

后来上海人发现并不是每一个印度人都是缠着红巾的锡克教徒，印度国内还有很多不缠头巾的其它宗教的民族。所以有些上海人就把"红头阿三"改成了"印度阿三"，这个不礼貌的浑号就一直沿用至今，几乎各地区的华人都习惯叫印度人为"印度阿三"，简称阿三。

诸位可能不知道，近几年"红头阿三"像胡汉三一样，又回来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乃至温州等中等城市的宾馆、饭店门口，又出现黑面孔、头上裹着大红头巾的印度门童，时间长了、阿三多了，不知是不是又重新成为"上国的文化"。

阿三为什么叫阿三

老上海人都管当年的印度巡捕叫"红头阿三"，上海人念这几个字的发音非常有节奏感，叫人听一遍就忘不了。下面就我所知，说一下上海人为什么称印度人为"红头阿三"。

红头的说法比较一致，是因为印度人头缠红布。虽然中国人也喜欢红色，但印度人用的红色和我们全球华人的大游行中的红海洋的红色不一样，我们用的那种颜色叫"中国红"，特点是"红得像火焰，灿烂的像朝霞"，和我们的革命理想和热情高度一致。而印度人用来包头的是一种暗红色，配上他们凶神恶煞的面孔和手中的大棒，让人感到有些压抑、害怕甚至战栗。红色容易让人联想起血液，"中国红"像是动脉流出来血，红头阿三的"红"更像是静脉血。

其实到上海的印度人不一定包红头，他们初到上海包头布的颜色，青黄赤白黑，五花八门各色俱全。我在电影电视里看到的好像以白头为多。但不管平时缠什么，一旦他们吃了巡捕房饭，或者做了门卫，就一律包起红头来，红头乃是他们的"制包"，如果派在外国牢监里服务，就一律包着蓝头，不过"蓝头阿三"总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猫着，平常人们看见的不多，见到的都是那些戳在大门口的门卫，或者是脖子上挂着哨子，手提哭丧棒的巡警，所以"红头阿三"的称呼最为普遍。若当时印度人在中国各行各业就业的话，我们看到的情况可能就不只是"红头阿三"，而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阿三头巾神州舞"（改编自《毛主席诗词》），可能看到的就是"彩虹阿三"。

至于为什么称"阿三"，而不称"阿二"、"阿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知道的有下面五种说法：

其一，阿三是洋人的统称，"猢狲"的雅篆。

那时的上海人形容猴子为"阿三"，在国人看来，举凡洋人，形貌举止皆如猴子，尤其以印度人之面貌黧黑更甚，而且民族"优越性"使然，觉得自家进化程度高印度一头（体毛稀疏就是一例），故此特（蔑）称印度人为"阿三"。但据说印度人虽然面孔是黑的，但其实是白种人。和他们近距离接触并仔细观察一下，就觉得他们虽然皮肤是黑的，手上有饭粒儿，身上有奇怪的香气，说起英语来有咖喱味，但凹眼窝，

高鼻子，大胡子，除了皮肤的颜色，构造和形状和金发的白种人都很接近，若身上涂满白灰，和西洋人无二，和前门楼后梆子的厚嘴唇非洲黑人则完全是两回事。

上海人管猴子叫阿三很有历史了，远在印度人到上海之前。婺源王仲贤君《上海俗语图说》，曰"阿三"者，猢狲之雅篆也。老上海在其开裆裤时代观赏街头耍猢狲时，但等耍猴人之铜锣一奏，"花果山来水帘洞"一唱，常常会人来疯似地大唤其猴曰："阿三，屁股头火着哉！"就是"阿三"同训于猢狲之明证也。老上海人说，小时候路上看见玩把戏人手里牵着的猢狲，嘴里就会这样唤出来，因为猢狲屁股是红的，所以要嘲他火烧，"阿三"者，猢狲之雅篆也。

据达尔文《原种论》上说："人类的原始祖先是猿猴，我们都是猢狲的灰子灰孙。"凹眼窝，高鼻子，黄头发，狭面孔的高加索白种人，看来是猢狲的嫡系子孙，因为他们的形态与猢狲最近似。西洋文化未输入我中华以前，我国的小把戏，早就看出这个特点来了，所以对于一切红毛洋人，皆尊称他们为"猢狲"，有时候亦直呼他们的雅篆"阿三"。小朋友们不谙事理，见解有限，把印度巡捕看作是街头猢狲的嫡派，其实还是可以理解的——却不经意地与伟大的达尔文氏暗合。

其二，阿三来源于洋泾浜英语发音。

有一种可信度颇高、已经被列入俚语辞典大百科的说法，就是当时上海租界的民众经常要与这些印度警察沟通，不过中国人的英语不好、印度人的咖喱味的英语也是怪腔怪调，所以当时上海的"警民沟通"、"警民共建"开展不顺畅。不过上海人居然从这种鸡同鸭讲式的沟通上，又找到了新的乐子。因为他们发现印度警察每回遇上了舌尖嘴利的上海民众的时候，总是会面红耳赤、吞吞吐吐，喜欢结结巴巴地反复讲着："I say.....，I say....."作为语言停顿。所以上海人就把印度警察的经典结巴名句："I say....."用上海话来发音，又变成了"阿三"。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不是"I say....."而是"I see"。由于 I see 的发音和上海话的"阿三"也很接近，因此便有了"阿三"的称呼。

另有一说认为阿三来源于"阿 Sir"，Sir 沪语音读如"三"，而"三"是单音节词，沪语（包括江南大多数地方方言）一般在单音词前置"阿"（或后置"子"、"头"等）组成词组使用。于是洋径浜英语称"Sir"为"阿 Sir"，音读如"阿三"，是市民对巡捕客气的称呼，而"印捕"头缠红巾，于是被叫作"红头阿三"，也就是"缠着红头巾的警察叔叔"。联想起今天的香港人也叫警察为"阿Sir"，所以此说也有道理的。还有一说是这样解释的：印度巡捕每天须在长官的指挥下出操，他们在表示对长官指令理解和执行时常齐声高喊："Yes Sir！"最初上海人不明白"Yes Sir"是什么意思，就把巡捕叫作"阿三"，也就是说，阿三是"Yes Sir"的沪语表达方式。这种说法比较符合印度巡捕作为打工仔的身份对 boss 唯唯喏喏的模样。

据玩疯狂英语的李阳说，上海人说日语漂亮，说英语不咋地，原因是上海人说话嘴张的小，我注意观察了一下，是这么回事。他们说"三"，绝不像北方人那样张开大嘴，只是发出类似普通话"塞"的声音来；我仔细听了一下，沪语中"三"的读法介于英

语的"see""say""sir"之间，上面几种说法都说得过去。而沪语中"阿"的读法与英语的"I"也接近，只是离"Yes"差的远了点，但这儿说的是标准英语，洋泾浜英语"Yes"应该如何发音就不得而知了。

其三，阿三说得是职业，凡是巡警都叫阿三。原因是巡长制服的袖子上有三道杠标记，上海人又把他们叫作"三道头"、"三条杠"。租界的巡长大多由本国人担任，巡捕则多为印度巡捕。印度巡捕的袖子管上有三条白道道，类似少先队的大队长。不同的是巡长红色的"三条杠"靠近肩膀，而巡捕白色的"三道头"在下边袖口上。阿三是指袖子上"三条杠"，按说安南巡捕和华捕也应该包括在内，但因为印度巡捕数量多、样子特别，给人的印象深，叫来叫去，就成了印度巡捕的专用称呼了。

其四，阿三说的是印度人的肤色。印度巡捕头缠红布，脸如黑炭，在国人看来一定印象很深："怎么那么黑，气死张飞、不让李逵，...在东山送过炭，西山剜过煤，开过两天煤厂子卖过两天煤，又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摘自：相声《卖布头》）"，故称"红头黑炭"。"炭"与"三"上海话同音，故后来上海讹呼为"红头阿三"；

进口黑炭的壮举不能算英国人首创。据记载，早在唐朝，李家父子搞对外开放，长安就已经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了，各种肤色的人满街走，见怪不怪。当时流传的一句行话，叫做"昆仑奴，新罗婢"。新罗的婢女等同于今天的菲佣，受过专业训练，乖巧能干，且从未发生过拐卖婴儿的事情，声誉胜过今日安徽保姆。而昆仑奴就是黑人奴仆，个个体壮如牛，性情温良，踏实耿直，干活实在，"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和血"，贵族豪门都抢着要。在唐代各类史书和笔记小说中，"昆仑"二字甚至作为形容词用来描述脸面乌黑的中国人。

原来都以为昆仑奴是非洲黑人，最近国家文物局下属的文物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葛承雍教授提出，在唐代史料中和许多传奇小说中，黑人都是能够飞檐走壁的大侠。他们大都水性非常好，能够钻入水中为主人捞起落入水中的物品，还能像猴子一样快速爬上桅杆。从非洲来的黑人恐怕很难有这样的功夫。为了查明唐代黑人来源问题，葛承雍教授遍查了各种史料，并在唐代黑人俑最多的西安几个历史博物馆和文物库房进行了仔细的辨认，与同行讨论磋商后，提出唐代黑人来源不是非洲而是东南亚和南亚的新解释。这一论文发表在最近出版的学术刊物《中华文史论丛》上。是不是真的，且姑妄听之。昆仑奴是南亚或东南亚黑人倒可能，只是以那出土的"唐代黑人俑"为依据有些悬乎，不知"唐代黑人俑"是不是又是大写意，和真人到底有几分想像很难说。若按古代人物画考证，上面的人物个个龟背蛇腰不说，很可能还会得出古人都没脖子的结论来。

其五，称阿三是因为印度人地位低下。因为印度是殖民地，所以印度人是亡国奴。中国不管怎么折腾，靠着李鸿章的左拦右挡，以夷制夷，也还捞了个"半殖民地"，地位应在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所以印度巡捕在上海人眼中的地位低于西捕和华捕，尽管印捕块头大，手持警棍，但也只能是排行老三，故称呼"阿三"。这里的"阿"，也是沪语单音节词前置"阿"的用法，跟阿哥、阿妹、阿信、阿发的用法差不多。开

个玩笑，鲁迅写的《伤逝》里有这么一段话："这是我（涓生）积久才看出来的，但同时也如赫胥黎的论定'人类在宇宙间的位置'一般，自觉了我在这里的位置：不过是叭儿狗和油鸡之间。"上海人对"中国人在中国的位置"定位的也很清楚，自觉了"自己的地位是在英国佬和印度人之间。"

虽然阿二中国人这么认为，可阿大英国人不这么看，他们发给印捕阿三的薪金比华捕阿二高一倍，还配给住房等，并在当时的戈登路巡捕房内（解放后为江宁路公安分局）建造了一座三层楼印度教堂。

印度阿三在上海滩的种种劣行我在文革期间就听上海人说过，据说当年上海人最恨的、最怕的、最瞧不起的人就是"红头阿三"。尤其是上海拉黄包车的车夫们，一提起"红头阿三"，话就会说个没完没了。原因是"红头阿三"狗仗人势，整天警棍乱舞，特别是对社会底层的那些摊贩、车夫、苦力、乞丐、难民，警棍与皮靴是家常便饭。

阿三们虽然也是殖民地出身，但狗仗洋势对半殖民地的华人十分凶狠。他们人高马大，腰间挂着一根警棍，胸袋中放一只警笛，见了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只要认为不顺眼，不管你是否违章和所谓犯法，轻者拳打脚踢，重者警棍伺候。大概因为他们头上包着厚厚的头巾，所以特别知道脑袋的重要，犯起狠来，经常是警棍敲头，专门欺负没有包头的华人。估计越南阿四也没少来皮靴踢警棍敲这一套，否则根本管理不了租界，只是身材瘦小，给人的印象不那么凶巴巴就是了。

人力车夫最怕遇到"红头阿三"。阿三也都是苦大仇深的穷孩子出身，最懂得穷人怕什么。他们最狠的手段是"撬照会"，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没收营运执照"，没有了执照人力车就不能上街，那时候也没有办假证、无照黑车这么一说，没有了营运执照这就等于断绝了车夫的生意，只好挨饿，要取回执照就得罚款。而阿三不通人情，软硬不吃，老刀牌烟卷、绍兴花雕酒之类的二十响、手榴弹阿三都不认，非得交罚款才行。

阿三另一教国人痛恨的事情是"抄把子"，也就是搜身。当时中国人在租界里等于亡国奴，见到"红头阿三"只要人家要检查，你就得举起双手，不管男人女人只好全身让他摸个遍。阿三们很多都是单身青年，尽管我没听说，估计吃豆腐的事没少干。因此，当时上海人恨透"红头阿三"，远远超过帝国主义买办。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上海人当时的反抗方式是以夷制夷，小孩子见了印度巡捕常常会高喊："阿三———老鹰（即老英，英国人）来了！"因"红头阿三"最怕英国人，见了英国警官像老鼠见了鹰，因此很紧张，大概会像我们在香港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原地跺脚、立正、挺胸抬头、口喊 Yes Sir，旁边的孩子们一定看得很开心。但接下去阿三看见没有老英来就知道受到了捉弄，"阿三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就跑来打小孩，孩子们前面跑得快，他们后面追的急，而且还要吹警笛，让四周阿三集体围剿，一时间警笛四起，警棍飞舞，这就大大出了"红头阿三"的洋相，小孩子就会觉得很开心。

我觉得这些传说比较可信，群众自发的反抗活动，恐怕大都停留在这个水平。我记得有位老教授告诉我说，40 年代他在北平上中学的时候，只要有单个的日本学生在

公共电车上，他们就仗着人多挤两下日本学生，或者说借着刹车的机会踩一下小鬼子的脚，和上海孩子们逗弄"红头阿三"满街跑的水平差不多。

"阿三——老鹰来了！"给人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印度阿三撤出上海后，上海人在街头看到耍猴戏的还这么叫。耍猴者划地为圈，手敲铜锣把过路行人吸引过来看，于是猴子在耍猴者的指令下作各种表演。在观看猴戏时，经常会有人大呼："阿三！老鹰来了！"上海人都知道，这喊声是吓唬猴子的。当时来上海耍猴戏者大多来自山东、河南等地，并大多不会讲上海话。而猴子又大多购自云南、贵州一带，肯定听不懂上海话，再讲上海城市里也很少能见到老鹰，所以"阿三！老鹰来了"还是阿三在的时候留下来的流行语言，就跟毛主席已经离开我们多年，静静躺在水晶棺材里，不再管世间凡事，让 13 亿中国人撒开欢地在小康路上狂奔，可我们在信誓旦旦到激烈处还要来上一句："向毛主席保证"。

阿三确有大智慧

没想到，芦区高手如此之多，在这里先谢下诸位。下面我还接着献丑。

在国人的印象里，阿三是又笨，又懒、又脏、又贱、又怕死、又落后，光是我们的 21%的大学入学率和他们的 7 成文盲一项相比，阿三已经和中国差了半个世纪，只配让中国人嘲笑。

若说阿三懒惰，我倒没什么意见，至少他们不像中国人这么勤快。不要说和福建人浙江人比，恐怕连中国北方人都比不了。我在国外曾经遇到一阿三同事，动不动就要盘腿静坐祷告，他们的祷告远不像我们拜佛那么简单，我们最多也就是三柱香敬拜佛法僧：第一柱香供养佛——觉而不迷；第二柱香供养法——正而不邪；第三柱香供养僧——净而不染。虔诚一点的，无非就是再配上三个响头，以后就可得到菩萨如来的保佑，无论是炒股、经商、生孩子，样样都可以顺心如意。他们仪式要麻烦得多，动不动就要坐上半个时辰，还外加很多清规戒律。远不像我们认为的，"早晚一柱香、晨昏三磕头"，便是宗教信仰。

至于说阿三脏，恐怕也不是没有根据，从印度旅游后来的人，提起阿三的卫生状况就皱眉头。不说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光是那用手抓饭的习惯就让人觉得"各拧"（北方方言，意思是"别扭"、"不舒服"）。据阿三说不用刀叉筷子，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食物本来的香味。这我倒也同意，有时候用手抓着吃东西确实过瘾。但若是光用手抓饭也就算了，可看印度人吃饭的时候还要把各种汤或菜和进米饭，捏来捏去，辅以搓攥捻揉，十八般武艺比划一番，然后再塞进嘴里吞下去，看得人胃肠翻江倒海，食欲全无。尽管人家一再给我解释是左手出恭，右手进食，左右分工明确，但心里还是接受不了。据说印度人上厕所不用手纸，用水洗，整个过程全用左手操作，所以就有"干净的右手，不洁的左手"的说法。据他们说这样可以每年节省很多钱，又环保，而且痔疮发生率极低。在印度，从来就没有流行过"十男九痔"、"十女十痔"之类的说法，马应龙痔疮膏没什么市场，倒是痢特灵之类的抗菌止泻的药物需要常备。

阿三贱和怕死是从中印边界自慰反击战得来的印象。我原来有个领导，号称参加过

中印边界自慰反击战，说当时参战的中国军人大多为川人，因身材矮小人称川耗子，作战异常勇猛，把大块头的阿三打得望风而逃。据他说，阿三欺软怕硬、欠打，原来我们忍让的时候他们趾高气昂，后来一动真格的，就老实了。印度人都是雇佣兵，不管方向如何，放够一定枪数就可抱头鼠窜，和中国军队"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林彪语录）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他还忿忿地说，NND，如果不是中央军委有令回撤，三天之内军队会师德里饮马恒河绝无问题。

惟独说阿三笨我看不出有什么根据，我曾经问过别人，为什么说阿三傻，他的回答是印巴人的目光都很呆滞、阴沉，给人的感觉是他们的思维很迟钝。远不像中国人看上去那么精明，双眼有神，眼珠滴溜溜来回乱转。我按照他说的观察了一下，确实是这样，而且中国还有句俗语，"贼眼闪金光"，说明人在思维的时候眼睛会有所表现。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曾流行的一句诗：总理回眸应笑慰，10 亿人擒妖打鬼凯旋归。总理会不会"笑慰"我看难说，但"回眸"一词用的很传神，就是总理头部轻摆再加上眼球运动，利用点余光就可知道身后发生的事情了（九大和林彪比坐下起立就是一例）。若用在尼赫鲁身上，至少要 180 度大转身才行，绝不会这么轻盈。

虽然阿三目光呆滞了些，但人家在处理国际事物上，可是"大块头有大智慧"，令我们这个盛产谋略家的国度蒙羞，这 20 年（1959-1979）人家可是实实在在干了几手漂亮的活儿。远不是咱们的"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谋略大师们可以望其项背的。看看印度的外交成果，我们也多少知道一点什么叫远交近攻，什么叫夹缝中求生存，什么叫"谁也不得罪"，什么叫"两头凑，赢不够"，什么叫"攻心为上"，什么叫"有多大肚就喝多少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真应该跟阿三学学怎样搞外交。

1、不战而屈人之兵，将锡金纳入版图。

这次看"海外华人爱国大游行"的图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三条标语："拖死达赖"、"同化藏人"和"Free all mankind（解放全人类）"，前两条无疑是当局处理西藏问题的重要政策方针，奇怪的是这种事情只能意会不可言传，怎么能做成标语在全世界游行。可是站在游行者的立场想一想，老子就是这么写了，你能把我怎么样？你们西方国家不是有言论自由吗？我说中国的事情，违反你们国家那条法律了？

后面这"Free all mankind"则引起我的驰思遐想，回到了年轻时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个时候，"Free all mankind"是我们每个青年人的革命理想，和现在这些彻夜攻读鸡阿姨、钻美国大使馆拿签证的年轻人不同，他们完全是调侃，我们那时候可是确实想着"Free all mankind"，而且也有真这么干成了的，像插队到云南的知青就有人越境参加了缅甸共产党游击队，后来革命理想破灭，成了金三角的大毒枭。现在云南边界走私贩毒的不少就是这些知青过去的前缅共分子。

我当时也有过"Free all mankind"到他国去干革命的想法，但仅停留在看世界地图、弄清敌我友，然后抒发一番革命感情的阶段。十几年以后出国，不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而是为了首先解放自己。当时我最拿手的事情就是能够背出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它的首都。背着背着就有了想法，就觉得西方国家和首都的名字都特别浪漫、动听、

上口，好像就要醉了一样：法兰西、英格兰、爱尔兰、美利坚、德意志、荷兰，巴黎、米兰、雅典，一看就是纸醉金迷的世界，还没有解放人家，就已经叛变了。而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的小兄弟们名字一个比一个怪异、生僻、难听：阿富汗、坎大哈、加尔各答、耶路撒冷、大马士革，这些地方给人的感觉人们不是拿锄把子就是操枪杆子。有些还可以让人望文生义从而望而生畏，埃及使人想到黄沙漫天、尘埃及顶，而秘鲁（我念了二十几年的 mi 鲁）很容易让人想到大便不通畅。

虽然我说的现象存在，但也有不少例外。我们的邻国锡金就是一个，起码让人想到矿藏丰富，联想再丰富些，还可以看到珠光宝气。这个国家后来就没怎么听说了，按现在说就是蒸发，再后来才知道成了印度的一个邦。仔细查了一下资料，才知道49 年印度独立时英国曾把锡金交给印度托管，就像相声里说得那样，后来就成了印度的一个邦，一块和阿三过起了小日子。

有个传统的相声段子《托妻献子》，最近郭德刚又把它翻新后演出，狠狠火了一把。这个段子的基本情节就是某人出差五年，把妻子托付给了自己的一个铁哥们，结果铁哥们和妻子过到了一起，还折腾出来两个孩子，等到某人出差回来的时候看到妻子正给老二喂奶。不光印度，越南也玩过这一手，不过挨涮的是中国。广西人都知道，原来越南海防白龙尾岛是属于广西省的一个岛屿，后来越南战争的需要，老毛给了越南人当基地，也没说清是"借"是"租"还是赠。谁料想越南小霸可不知道什么"勤借勤还，再借不难"的中国古训，只记得"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不懂得"亲兄弟、明算帐"，只认"中越情意深，同志加兄弟"，一来二去，白尾岛就成了越南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下面是官方说法（来源于百度）：

"白龙尾岛历史上是中国领土，1887 年（清光绪十三年），清朝与法国签订边界条约，划分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边界。以商务利益换得钦州附近的江坪、黄竹两处越南飞地。对于海上边界的划分，法国提出以北仑河河口所在的东经 108 度 03 分向南延伸，作为海上岛屿及北部湾的划分界线。根据这一划法，白龙尾岛将归法国所有。但这一分界方法没有被中国接受，1952 年中国方面将其收回，越战期间，该岛曾作为防城至海防的海运物资中转站交予越南方面，2000 年 12 月 25 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了《北部湾划界协定》和《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白龙尾岛正式确定为越南领土。"

阿三这一手玩得更漂亮。下面的官方材料是阿三吞并锡金的全过程：

"锡金建国于 13 世纪，居民原是东南亚亚参山脉(Hills of Assam)一带的勒嘉人(the Lepchas)。15 世纪之后，西藏的藏民开始移居锡金，并带来影响至今的西藏喇嘛宗教。锡金立国后，曾不断地被尼泊尔、不丹、西藏侵犯。19 世纪，被英国强行占领；1949 年 6 月初，印度以"防止动乱和流血"为由，派兵进驻锡金，接管了成立不到一个月的新政府，并委任印度人拉尔为锡金首相。1950 年 12 月签订《印度和锡金和平条约》，锡金从此成为印度的"保护国"，国防、外交、经济等均由印度控制。印度政府于 1973 年 4 月对锡实行军事占领，5 月 8 日印锡签订《锡金协定》，规定锡内政、外交、国防、经济均由印度政府负责。1974 年 6 月 20 日，锡议会通过了由印

度拟定的锡金宪法，规定印度政府派驻的首席行政官为政府首脑和议会议长。同年9月《印度宪法修正案》规定锡金为印度的"联系邦"，在印度两院各为锡金设一个议席。1975年4月，印度军队效法当年英国人的做法软禁了锡金国王。1975年4月10日， 锡金议会在印度的操纵下通过决议废黜前国王纳姆加尔，把锡金变为印度的一个邦。印度议会也通过决议正式把锡金变为印度的"锡金邦"，完成了吞并锡金的步骤。2005年4月以后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地图上锡金已被剔除国家, 这说明中国政府已正式承认印度对锡金的吞并。"

真不敢相信，在二十世纪70年代，吞并一个主权国家，居然还可以这么简单。

先不说锡金纳入自己的版图有什么实际好处，光是这种漂亮的大手笔就令人震惊！整个过程可以说是悄无声息，锡金国政府和人民未见什么什么激烈的反抗，基本上是和李勇奇听说要攻打威虎山后的反应差不多，"早就盼着这一天了！"。阿三占领后对锡金管理的也很成功，时至今日，也没怎么听说局势有什么动荡，三十年来锡金人基本上是"经照念，头照磕，香照烧"，要知道，锡金人信奉的是藏传佛教，和印度人信奉的印度教可是两回事。这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文化问题都是怎么解决的？就算把锡金白送给中国，恐怕也是烫手的山药。况且由于社会制度不同，印度绝无可能像我们对待西藏和香港一样投入天文数字的资金。恐怕就是白给我们一个锡金，我们也对付不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这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毛主席语录》）。

更令人奇怪的是，国际社会也没见什么动静，无论是两个超级大国、西方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反对动作。而且很快锡金邦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硬撑到底的还就是中国。当时中国认为印度的侵略行为完全违背了中印两国当初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上当时中印边境战争的阴云未散，双方尚未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因此中国一直拒绝承认锡金是印度的一个邦，仍旧把锡金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看待。锡金人民不急中国人民急，一直为锡金人民死撑了28年，所以若有人说中国不讲原则完全可以拿这件事噎他回去。

直到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时，中国在锡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才开始松动。瓦杰帕伊访华时双方签署的一份边贸协定中悄悄使用了"锡金邦"这个术语。国外评论认为，"这实际上是间接承认了锡金是印度的一个邦"。在同年10月8日，瓦杰帕伊总理与中国总理温家宝巴厘岛会晤之前的30分钟，中国将锡金从外交部网站上亚洲国家的名单中拿掉了。按照印度媒体的说法，中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还承认锡金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国家。

不光是吞并锡金国际社会没反应，阿三在国内打击分离主义，也不见国际社会（含西方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说三道四，从来都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2003年甚至为消灭分离主义组织"阿萨姆解放阵线"还打到了邻国不丹，最后这个分离主义组织就是在不丹给消灭掉的。在美英西方国家眼里，阿三有着相同的价值观，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对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来说，人家又代表着不结盟运动，象征着新兴力量，是团结争取利用改造的对象。1950年代初，尼赫鲁执政时候，印度还干过点准社会主义，并仿照苏联制定了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就这样一来二去，阿三成了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相拉拢的香饽饽。

当年中印边界冲突也是一样，人家是"得道多助"、我们是"失道寡助"，在冲突中公开表示支持中国的只有越南、朝鲜、缅甸和巴基斯坦等为数不多的国家。反对中国的行动，同情和支持印度的共有 75 个国家。据说中国撤兵还与此有关。包括苏联在内的很多国家都认为认为，中国人进攻的是不结盟运动，而不是印度。苏共领导人还明确指出，中国对印度的进攻，是中共同其他共产党之间的巨大争论的突出表现，即对不结盟运动和和平共处的不同认识。

就是今天也一样，像印度国内打击分离主义的事情如果放在中国，就会引起"国际反应"，西方各国国会都要通过决议，说三道四，指责中国没有人权。社会主义阵营的同志、亚非拉小兄弟也不含糊，要借此机会狠狠敲诈点"无偿援助"，给的少就给你摔脸子，不给就和你撕破脸皮干，绝无商量的余地。而阿三经过几十年的折腾，人家终于实现了我们当初的梦想：阿三的朋友遍天下！

要说阿三没有和别的国家结下梁子也不对，巴基斯坦就是一个，怎么办？分裂它！这么大个事情，人家阿三还真就干成了。

先说几句闲话。坛子里现在都是和 64 有关的贴子，我这系列内容太过陈旧，谁让咱们写得慢尼。当初写样板戏系列就是这样，别人都早已经换了若干话题，我还在那没完没了地念叨样板戏，好在当时老芦提出"散伙、散伙，我回我的高老庄，你回你的流沙河"，坛子里没什么太多的文章，让我这个老纺车慢慢地摇。以后争取跟上诸位前进的步伐，不过六四的事情我是不想谈，想说说这些年中国社会到底发生了哪些进步，因为堕落的事情已经被你们都说完了。之所以想说这个话题，还是看到老芦在凯迪博客中一位读者的跟帖（http://blog.cat898.com/boke.asp?ludi.showtopic.167115.html ）：我在北京天天做地铁上下班，几乎就看不到有老人站着。年轻人给他们让座已经成了习惯，社会进步毋庸置疑，老卢大可对此放心。

这个读者说的不错，"社会进步毋庸置疑"，在文章里我要表达的大概意思是，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kind, one giant leap for Chinese. 这是我年轻时学英语记下的句子，是美国宇航员登上月球时说的一句话，原话是：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a)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咱们翻译成"个人一小步，人类一大步。"

2、成功分裂了巴基斯坦，将来自敌对邻国的威胁彻底解除。

翻开现代史，好像当今世界没有谁能像阿三一样，在 20 世纪 70 年代，干净利落将自己的对手一分为二，永久地解除了敌对邻国巴基斯坦对自己的威胁。在这个问题上阿三很聪明，"知彼知己"，知道自己的实力，更知道两个超级大国和中国的软肋在哪里：苏联有求于阿三——印度历来是苏联在南亚的一颗棋子；中国不敢惹阿三——中苏边境大军压境，我们的政策是北紧南松，根本无力再打什么"自慰反击战"；美国不愿得罪阿三——西方国家与印度关系良好，美国支持巴基斯坦只是为了抗衡苏联，而且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扩大在南亚的影响。所以看起来支持巴基斯坦的国家不少，又是美国又是中国，可都是有一搭无一搭，而且根本做不到"小妹妹唱歌郎奏琴，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

结果证明阿三的判断完全正确，后来基辛格回忆说，战争发生后，美国认为，无论东巴留在一个巴基斯坦内还是通过政治途径独立出去，美国都可以接受。据巴基斯坦的外交官说，当时美国军方以各种名义拖延、暂扣了应该迅速交给巴基斯坦的武器装备，而印度采购了大批前苏联的先进战斗机，彻底把巴基斯坦击败，取得了制空权。此时巴基斯坦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世界孤儿"，巴国一个政府资深人士对总统说："我们已经被世界所抛弃"。

第三次印巴战争发生后，苏联全力支持阿三，美国只是坚持保障西巴的独立与完整，最担心的是苏联和中国，并没有针对阿三的任何行动。所以美国只是最后在西巴面临危险时，派出一支舰队做出姿态，表明对西巴独立和完整的关切。而中国，从头到尾就是瞎咋呼，胡搅和，乱开空头支票，整个一个大忽悠，结果是乱了自己，毁了巴基斯坦。

先说一下巴基斯坦的情况，从中也可以看到一点中国的影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世界先后主动或被迫放弃了旧殖民主义政策，原来的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1947 年，英国准许印度独立，答应将印度移交给印度人管理。印度是个多种族的国家，印度教徒最多，其次是伊斯兰教徒。英国统治的时候，虽然也有不少乱子，但还能镇得住，"阿三——老鹰来了"就是证明。一旦要独立，印度的穆斯林就没有人镇得住了，必须分而治之。当蒙巴顿将有可能使印度分为几个独立国家的方案交给国大党主席尼赫鲁和穆斯林联盟领袖穆罕默德•阿里•真纳时，遭到了他们的一致反对。愤怒的尼赫鲁甚至不顾礼节，把方案副本使劲地扔在地上，忿忿地说道："不行！"穆斯林领袖真纳则坚持要将东西两个穆斯林聚居区置于一个统一国家的领导之下。

真纳将 1946 年的 8 月 16 日定为建立巴基斯坦穆斯林国家的直接行动日。回回不同于咱们的愤愤，从来就是说干就干，说句翻译体的中文，就是有"很强的行动力"。到了那一天，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教徒们展开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仇杀，从加尔各答到达卡，3 天之中有 5000 人死亡，2 万人受伤，10 万人无家可归。蒙巴顿无奈按照他们的意愿修改了方案，这块次大陆最终被分成以印度教为主的"世俗"印度以及较小的伊斯兰教国家巴基斯坦。因为真纳的坚持，巴基斯坦拥有了少见的"双头版图"——巴基斯坦被分为东西两部分，印度被夹在了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中间，这个方案被后人称为蒙巴顿方案。其实蒙巴顿本人很不情愿，属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得以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干了些违心的事"。蒙巴顿还放出话来：不出 25 年，东孟加拉一定会脱离巴基斯坦，真纳的双头巴基斯坦注定要消失。1971 年，孟加拉国脱离巴基斯坦独立，蒙巴顿的预言果然应验。

巴基斯坦建国后，东西巴之间始终存在矛盾。不光是地理上的相互隔绝，东西巴之间民族、文化和语言也存在着巨大差异。东巴人绝大部分属孟加拉族，操孟加拉语；西巴人分属信德、旁遮普、俾路支和巴丹等几个民族，两地居民的文化和民族都不尽相同。还有就是存在着我们说的"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东巴感到虽然自己的人口占多数（1971 年占 54%），但在政府中居次要地位，有影响的政府职务不让东巴人担任，而且中央政府的税收也不拨付给东巴发展经济，东巴人由此产生了严

重的离心倾向。总起来说，东、西巴合为一体的基础仅仅是伊斯兰教，这种基础十分脆弱，阿三把这些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由于一些宗教、领土、民族问题，印巴也长期相互敌对。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在信仰、法律、道德标准、习俗、服饰、语言等方面都有不同，甚至有截然对立之处。如印度教崇拜以三大神为主的众神，伊斯兰教崇拜安拉。印度教徒宣扬轮回转世和解脱，伊斯兰教宣扬"末日审判"。这些信仰和价值观的不同成了教派冲突的重要原因。就生活习惯来说，印度教把牛看的很神圣，而穆斯林就好这一口，看见印度大街上牛们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就咽口水，如果能够达到鲁迅所说的那样丰富的想象力的话（看见大腿，则想到性交），则还可以想到牛百叶牛蹄帮甚至牛鞭。

从地理位置来看，当时的巴基斯坦是东巴西巴两大块，一左一右把印度夹在了中间。而且由于历史、宗教和边界领土的原因，巴基斯坦总是和阿三别苗头，始终尿不到一壶里去。谁都知道回回好勇斗狠，"行动力"极强，当年收拾百战百胜红四方面军的就是西北的回回。一旦开战，阿三必将腹背受敌。

独立后第一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就由于克什米尔争端干了一仗，以后在中印边界冲突时巴基斯坦又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是极少数支持中国的国家之一，很是令阿三不痛快，一直耿耿于怀。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中印边界冲突的重要后果，中国和巴基斯坦关系得到实质性的发展。1963 年 3 月 2 日，中巴两国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协定》，由此中国改变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这也是那个年代中国的一贯做法，和你好的时候，穿一条裤子都嫌肥。中共领导人还多次表示，如果阿三向巴基斯坦发动全面进攻，中国不会置之不理。在中印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巴基斯坦成为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战略伙伴。巴基斯坦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激怒了阿三。

据老上海人说，阿三有个特点，记仇。当初孩子们玩以夷制夷，用"老鹰来了"捉弄猴子阿三，阿三记性极好，一旦让阿三看到了你的"米库（上海话，面孔）"，下次阿三再见到你的时候，一定要"手持警棒将你打"。从阿三对巴基斯坦的态度来看，是这么回事（当然还有边界问题等利益冲突，两国在克什米尔地区存在着长期的领土争端）。"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一到，一切全报"，到了时机成熟的 70 年代，到了 1971，印度以"防止动乱和流血"人道主义为由，派兵入侵东巴，把巴基斯坦成功地分裂成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两个国家，腹背受敌之患彻底解除。那个时期的倒霉蛋就是总理布托和总统叶海亚•汗。

小青年们可能不知道，70 年代的时候民间私下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谁跟中国好谁倒霉。其中就包括巴基斯坦这档子事。其他人还包括尼克松、田中角荣、波尔布特等。

70 年代电影院演电影，先要放几集"新闻简报"，所以就有了"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莫名其妙，罗马尼亚搂搂抱抱"的说法。托"新闻简报"的福，至今还记得当时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在新闻片中的模样：正宗的武夫军棍做派，身材敦实，论扛木头和贾庆林有一拼；而总理兼外长布托（也就是前几天死的那个铁蝴蝶他爹），个子不高，带着眼镜，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当时老布托曾在联合国发表了"金色的巴基斯坦"的演说，说到动情处，老布

托还流下了眼泪，泪洒联合国大厅，很让亿万中国人民感动了一场。

巴基斯坦独立后 60 年的历史，简单说就是 25 年的文官统治，35 年的军政府管理。给我的感觉是只要一实行民主，国家就动乱，陷入无休止的争吵，谁也不服谁，什么都乱糟糟，经济也停滞，政府既腐败又无能。然后出来个陆军总参谋长或总司令之类军人上台，废除宪法，实行军事管制，"以独暴制群暴"，国家就安定几年，发展几年，然后权力逐渐减弱，发生全国骚乱，军人政权被民主浪潮掀翻。

1958 年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发动了不流血政变，把伊斯坎德尔•米尔扎总统遣送出国，自任总统，对全国实行军法管制，开始了他对巴基斯坦长达十年多的统治。到了 1968 年，席卷巴基斯坦全国的骚乱迫使阿尤布•汗将军辞去总统职务，将权力移交给陆军总司令叶海亚•汗。新总统再次下令实行军事管制，并中止执行 1962 年的宪法，宣布国内形势未稳定之前，禁止政治活动。

巴基斯坦的军事管制最终于 1970 年取消，叶海亚•汗举行了巴基斯坦建国 23 年来的第一次大选，叶海亚•汗差点就成了"巴基斯坦民主之父"，但实际上这个重归民主道路的举动却带来了悲剧性的结果。

长期以来，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举行国民议会和省议会选举时，以谢赫•穆吉布•拉赫曼为首的人民联盟仰仗东巴基斯坦在人口上的优势，以地方自治为旗帜，主张加强省的权力，得到大多数东巴基斯坦人的拥护。选举的结果，要求高度自治的东巴政党——东巴人民联盟赢得国民议会 313 席位中的 167 席，一跃成为议会中的多数党，而西巴政党——人民党则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反对党，但人民联盟在西巴却未能取得一个席位；同样人民党在东巴也未获得一席之地。鉴于拉赫曼在国民议会拥有多数，能够将其高度自治的竞选政纲变为现实，使东巴人看到了希望。

我常常在想这么个问题，是不是中国"有一天"要实行民主一开始也必须是个伪民主，而且也需要有个小前提，就是在共产党处于绝对优势下进行，而且第一次民主的结果一定是党所希望的结果，至少出入别太大，哪怕以后等我们已经进入了民主程序，习惯了妥协和让步再出现变化。如果一开始就和重权在握的掌门人所期望的差距过大，会怎么样？看看巴基斯坦的结果吧。

独裁军棍搞民主，最希望的就是走走样子，最后达到自己的目的。民主是形式，而不是目的，甚至连手段方法都不是。巴基斯坦选举的结果令西巴不能接受，遭到了叶海亚•汗和布托的联合抵制。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要求拉赫曼的人民联盟和布托的人民党进行磋商，在四个月内制定宪法，否则，便要解散议会，实行大选。布托从西巴飞到东巴的达卡，与拉赫曼谈判，希望能制定一部双方都能接受的宪法，并维护国家统一，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权。而拉赫曼民主的诉求却是坚持实行东巴基斯坦全面自治。

正当布托在达卡与拉赫曼磋商之际，军人出身的叶海亚•汗等不及了，出动军队对拉赫曼的东巴人民联盟实行军事镇压。士兵和坦克包围了电台、报社，开始了屠杀，600 万孟加拉难民逃向邻国印度，拉赫曼成了叶海亚•汗的阶下囚。许多东巴政界人

物逃往印度避难并组建临时流亡政府，1971 年 3 月 26 日，东巴宣布独立，成立孟加拉人民共和国。

最初美国采取了不介入政策。但随着东巴人道主义危机的加剧，政府的不介入政策遭到了国务院、国会、媒体的质疑和反对。4 月 6 日，美国驻东巴首府达卡总领事馆的 20 名馆员联名致电国务院，表示不能支持政府接受巴基斯坦政府在东巴的行为的政策，要求重新制定美国的政策。驻印度大使基廷（Kenneth Keating）主张立即公开对这种"野蛮的行径"表示遗憾，私下对叶海亚施加压力，立即暂停向巴基斯坦交付任何军用物资。 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 Rogers）也认为"是时候重新考虑我们对巴基斯坦的基本立场了"。

西巴军队在东巴的疯狂行动，给了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一个借口，她抓住时机，打起"建立共同秩序，使不断逃亡到印度的难民能回家园"的旗号，于 1971 年 12 月 3 日，以制止屠杀和流入该国的难民潮为借口，在苏联的支持下于派遣 30 万地面部队入侵东巴。尽管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苏联插手南亚事物，可阿三是"正义之师"、"人道之师"，符合西方的普世价值。

叶海亚•汗总统虽是军人，此时也慌了手脚，难以招架，急忙去向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布托求救，希望他立即前往联合国，要求安理会制止印度对巴基斯坦的侵略。

12 月 9 日，布托以副总理兼外长的身份率巴基斯坦代表团飞往美国纽约。在安理会大厅中，布托慷慨陈词，向参加会议的 100 多个国家的代表揭露印度的侵略行径，要求联合国立即制止印度的侵略行为，布托还与刚刚恢复联合国席位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皮埃尔饭店紧急磋商。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黄华信誓旦旦地向布托承诺："中国政府将全力支持巴基斯坦。"

12 月 11 日，东巴基斯坦军队面临着数倍于自己的强敌，岌岌可危。布托接到报告："军队最多还能坚持 36 小时。"布托一面与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接触，希望中国出面干预印度的进攻；一面要求美国向苏联施加压力；同时紧急致电叶海亚• 汗总统，要求军队坚持抵抗，并要求叶海亚•汗在西巴开辟西部战场，以减轻东巴部队的巨大压力。

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直接打电话给布托："美国十分担心中国站在巴基斯坦一边进行军事干预。"基辛格还直接越过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乔治•布什，与中国代表团交换意见。

12 月 12 日，布托又紧急呼吁安理会通过决议，向巴基斯坦派遣联合国部队，英、法等国投了弃权票，苏联投了否决票。布托焦急与悲愤的心清溢于言表，他激动地对英、法代表说："你们或站在正义的一边，或站在非正义的一边；或站在侵略者一边，或站在被侵略者一边。根本不存在中立，你们应该表明立场。"

12 月 16 日，联合国大厅的讲坛上，最后一次响起布托愤怒的声音："你们想强行做出决定，制定一个比凡尔赛协议更糟的协议，使侵略合法化。我不想参与这一切。好了，你们要你们的安理会吧，我告辞了。"说完，他率巴基斯坦代表团退场。他说：

“即使我们在军事上在达卡失败，我们也不能成为政治上投降的一方，我要通过退出联大会场表明：尽管我们的物质被摧毁，但我们的意志和自尊却不能被毁灭。”

1971 年 12 月中旬，印度彻底击败 9 万西巴军队，抓获大量俘虏，占领东巴大片领土。被包围在东巴达卡的巴基斯坦军队向印军投降，这实际上结束了西巴对东巴的控制。真纳的双头国家从地图上消失了，一个新的国家——孟加拉国从此诞生。消息传来，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便欣喜若狂地赶到新德里的议会大厅宣布：“现在达卡已是一个自由国家的自由首都了。”随即，印度宣布承认孟加拉国独立。阿三就是会来事，直到最后，人家也不忘把自由、人权、民主这些西方国家最爱听的话挂在嘴边。

尤其不能让我们理解的是，当时的形势对阿三极为有利，只要“宜将剩勇追穷寇”、“痛打落水狗”，拿下西巴指日可待。而人家阿三却“沽名学霸王”，就此打住。一方面可能是阿三认为没有必要，分裂后的巴基斯坦根本不再有和印度抗衡的能力，这已经被日后的事实所证明；二是这样也给足了美国和联合国面子，即“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被迫停火”，避免了和苏联结盟而自绝于国际社会的尴尬。当时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认为“如果我们垮下去（指西巴垮掉），苏联人不会尊敬我们，中国人会看不起我们，其他国家也会得出自己的结论。”最后的结果，让美国人和国际社会都认为，美国在南亚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稳定世界局势做出了重要贡献。美国在这之后，与印度的关系进一步改善。

老家伙大概都记得，当时中国政府的表现很有意思，整个一个“皇上不急太监急”，在巴基斯坦政府已经承认孟加拉国独立的情况下，我们还在亢奋，在那里独抗大旗，拒不承认孟加拉国，强烈谴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支持印度反动派分裂巴基斯坦的阴谋，弄得整个国际社会一头雾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记得当时和几个哥们也私下揣摩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直到三十七年后的今天也没琢磨出个名堂来。

顺便说一下，当时的印度总理是被后世阿三称为“印度的老祖母”的英迪拉•甘地夫人，按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世界政坛三女杰之一，另外两人是以色列的梅厄、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一条披着莎丽的印度雌狼”（莎丽 Sari，印度传统服装）。21 世纪的钟声敲响之际，英国广播公司（BBC）举行的“千禧最伟大的女性”评选，千禧女性十杰里面，拔得头筹的就是这位阿三的女总理。后面几位分别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修女特里萨、科学家玛丽•居里、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法国女英雄圣女贞德、女权主义者埃米琳•潘克赫斯、缅甸的昂山素姬、美国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夫人埃莉娜•罗斯福。

印巴建国以来，双方进行了三次印巴战争，每一次都是印度占了便宜，最后还分裂了巴基斯坦。从阿三肢解敌对邻国的全过程来看，完全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收拾老蒋时的做法，“有理有利有节”，阿三是得了便宜又卖乖，乱了敌人，锻炼了队伍，总统还能永垂史册，称得上“收获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而且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克什米尔争端也在巴基斯坦做出巨大让步后基本得到了解决，其中阿三又占尽了便宜（后边我总结了个小资料，诸位可以看看）。

横看竖看，实在看不出阿三蠢在哪里，更看不出来我们有什么理由嘲笑人家。

小资料：印巴的克什米尔争端是怎样解决的

克什米尔争端是指印度和巴基斯坦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主权纷争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现在的克什米尔地区是查谟－克什米尔的简称，包括克什米尔谷和查谟平地。这本来是两个独立的邦国。查谟居民主要信奉印度教，克什米尔居民却基本上信奉伊斯兰教。1846 年查谟首领从英国人手中买下了被占领的克什米尔。而克什米尔人口数倍于查谟。这就种下了后来争端的根源。独立前的印度，行政上由两大部分组成：英属印度和土邦。英属印度包括 11 个省，而在这些省中间，夹杂着大约 550 个的土邦，克什米尔就是最大的土邦之一。蒙巴顿方案规定让克什米尔人自由选择归并印、巴一方或宣布独立。土邦地区归属则由当地的王公来决定，但是土邦必须考虑所在地区的地理因素。

克什米尔情况很特殊，它处于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地理因素"的考虑在这里不起作用。根据"蒙巴顿方案"的规定，印度教徒居多数的地区划归印度，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归属巴基斯坦。但对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却规定由各王公土邦自己决定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或保持独立。当时，克什米尔地区 77％的人口为穆斯林，他们倾向加入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土邦王是印度教徒，他先是既不想加入印度，也不愿加入巴基斯坦，但最后又倾向加入印度。因此，印巴分治时，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未能得到解决。

第一次印巴战争：印、巴分治后不久，双方为争夺克什米尔主权于 1947 年 10 月在克什米尔地区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即第一次印巴战争。1947 年 12 月，印度将克什米尔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1948 年 8 月和 1949 年 1 月，联合国印巴委员会先后通过关于克什米尔停火和公民投票的决议，印巴均表示接受。1949 年 1 月双方正式停火，7 月划定了停火线。克什米尔分为印控区和巴控区，印巴分别在各自控制区内建立了地方政府。印度方面控制了克什米尔地区三分之二的土地和四分之三的人口，其余为巴方控制。

第二次印巴战争：1965 年 6 月，印巴围绕克什米尔问题爆发第二次战争，后来在美国约翰逊政府和联合国的干预下停火。

第三次印巴战争：1971 年 12 月，在因东巴基斯坦脱离巴基斯坦而爆发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印度又占了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部分土地。

1972 年 7 月，印巴签署了《西姆拉协定》，双方同意在克什米尔地区尊重 1971 年双方停火后形成的实际控制线。为了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印巴两国领导人和部长级官员数次举行会谈，但一直没能达成协议。1989 年后，双方在克什米尔地区不断发生交火，两国均蒙受巨大损失。

2003 年 11 月 23 日，巴基斯坦总理贾迈利宣布，巴军队将从穆斯林的重要节日开斋节（26 日）开始，在克什米尔印巴实际控制线的巴方一侧实现单方面停火。24

日，印度对这一建议表示欢迎，并于25日作出了积极回应。两国军方25日经磋商决定，自当天午夜起在克什米尔"国际边境"、"实际控制线"和"锡亚琴实际接触线"（印方称为"实际地面位置线"）一带实现停火。双方同时表示，希望停火永久持续下去。

2004年1月7日，在印控克什米尔的查谟市西北30公里靠近印巴实际控制线的杰纳布河上，民间团体"印度青年之声"的一名成员在向河中投放装有糖果的盒子，希望这个盒子能漂到下游的巴基斯坦，把他们支持印巴对话和解的美好愿望带给巴基斯坦人民。

2005年4月7日，载满乘客的公交车分别从克什米尔的印控区和巴控区双向对开，这是近60年来印巴克什米尔地区之间的首次通车，开启了印巴和平进程的新篇章。

2005年10月地震后，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巴印双方在伊斯兰堡达成协议，同意暂时开放克什米尔实控线5个检查站，以允许两边的居民共同展开震后救援行动。

没有阿三，就没有西藏问题国际化

众所周知，1935年10月19日，"锣鼓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陕甘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到吴起。"朱毛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后又在直罗镇打了个胜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直罗镇一仗尽管不过是一次普通的战役，却赢得毛泽东如此高的评价，看来老毛对它的特殊而深远的军事意义和政治意义很看重，简单说就是红军终于有个落脚的地方了。

记得文革的时候看批判高岗的文章，说高岗和刘志丹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后来高岗野心膨胀（主要是不服周恩来，尤其是不服刘少奇），口吐狂言说出"没有陕北就没有中央红军，就没有中国革命的今天"。而我看这句话对今天的西藏问题也很适用：没有阿三就没有达赖流亡政府，就没有西藏问题国际化的今天。当年尼赫鲁接纳达赖和流亡藏民，等于是"给达赖把藏独大本营放在达兰萨拉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从此便可"阿三达赖手携手，走向世界闹独立"（改编自《长征组歌》，虽然现在达赖的主张不再是西藏独立了，而根据政府的观点，这头"披着僧袍的狼"实际上还是"假自治，真独立"）。

从一开始，人家阿三的头脑就很清楚，牢记中国古训"远交近攻"，知道该怎么对付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印度政府于1950年4月1日与中国建交，是最早和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尼赫鲁当时思路很明确，他说："印度承认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控制了中国，而不是因为印度赞同共产主义或中共的政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军队入朝参战。中国参战后，尼赫鲁呼吁美国同意召开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会议，以便实现停火并在朝鲜半岛划定非军事区。但美国决策者婉言拒绝了尼赫鲁的建议。从现在来看，这些都是富有远见的做法。这也是几十年以后老邓才悟出的那个道理：谁也不得罪！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把南亚政策的重点放在巴基斯坦，1954初，艾森豪威尔公开

宣布美国军事援助巴基斯坦的决定。这么冷落阿三，不是拿武大郎不当神仙么。但阿三并没有"强烈抗议"、"严重关注"，而是把"印度的不结盟政策逐渐走向亲苏的不结盟政策"，1955 年尼赫鲁访问苏联，美国《新闻周刊》评论说，尼赫鲁正在带领印度直接投入苏联阵营。这实际上是给美国脸子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一招果然奏效，为了拉拢尼赫鲁，抗衡苏联，美国随后加大了对印度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印美关系渐渐进入蜜月期。印度目的终于达到，成为游离于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香饽饽，从中印边界冲突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世界也真正知道了什么叫"两头凑，赢不够"，以后金家父子在中苏翻脸后也是这么干的，也非常成功。我记得那时候金日成要么是结束对中国的友好访问前往莫斯科，要么是从莫斯科到北京，利用中苏矛盾赚了个盆满钵满。

印度与中国的关系开始也很好。尼赫鲁在印度独立后认为，中印两国将"世代友好下去"，但他后来意识到印度和中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他说："自从中国革命以来，我们自然不得不考虑新中国将以何种面目出现。我们认识到，这次革命在亚洲和全世界以及对我们自己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强大的中国一般来说是崇尚对外扩张的，考虑到中国一旦强大就会产生内在的扩张动力，我们已意识到印度面临的危险，这种危险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日益显露出来。如果有人以为我们在推行政策时没有认识到这种危险，那他就大错特错了。"

现在讨论国际问题，人们动不动就说"捏住了 XX 国的睾丸"。中国手里捏着别国的几个睾丸不知道，依我看目前连根屌毛也没有，将来"海外华人大游行"、"网民抗议"有没有可能起到这一效果还有待观察，反正现在朝野上下都很看重这两招，认为靠这两招就可捏住世界各国的睾丸。而且睾丸捏在群众手里远比捏在政府手里更方便，捏起来也更爽快、更随意，人多力量大，捏起来让对方更疼痛。起码人们现在已经达成共识，用这招收拾个 CCN 节目主持人、好莱坞明星、世界 500 强之类的纸老虎很奏效。

中国的两个睾丸确实捏在别人手里。台湾算一个，捏在了美国手里。高兴时就松一松，重申"三不一没有"，顺便多卖几架波音飞机；想牵制中国时就手头紧一紧，让阿扁走走红地毯，逼得中国大搞军事演习，然后老美再趁机倒腾点过时武器，侃个高价，敲阿扁一个冤大头。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经济上捞了实惠不说，还确实把台湾打造成了美国在中国海域里"不沉的航空母舰"，对中国安全构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和威胁，我认为这才叫"下一盘很大的棋"，称得上是世界外交史上经典之作，投入最小最小，收获最大最大，有永恒的研究价值。

中国的另一个睾丸是西藏问题，好像阿三和西方各国都捏着一点。1959 年，就在中印关系发展最好的时期，阿三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要想办法拿住中国。1959 年西藏叛乱失败后，十四世达赖和他的追随者辗转经历了一年多的亡命生涯，最终在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的山区小镇达兰萨拉（Dharamsala）安定下来，随后便重整旗鼓，收拾整顿起陆续前来投奔的流亡藏人，于 1961 年在达兰萨拉宣布成立"岗钦吉雄"（大雪国政府）、国旗为雪山狮子旗，流亡政权的元首就是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称为"披着僧袍的狼"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拉木顿珠-丹增嘉措。现在看来，整个逃亡过程和背景和当年朱毛红军差不多，最后到达达兰萨拉，意义就和红军长征到了吴起镇一样。尼赫鲁实际上就是给达赖提供陕北根据地的刘志丹高岗。

在1959年镇压叛乱时，国际社会除了美国、印度等少数几个国家象征性地表示了"遗憾"以外，其他国家对于西藏分离运动都持冷漠态度。在印度尼赫鲁政府的默许下，达赖及其追随者以印度的达兰萨拉作为海外流亡活动的大本营，开始发起旷日持久的西藏分离运动（或曰藏独、西藏高度自治），时至今日，这场运动已经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在将近50年的时间里，整个世界经历了东西方冷战、美苏争霸、苏东剧变，中国也经历了大跃进、大饥荒、四清、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六四、市场经济等一系列巨变，而达赖喇嘛和他的西藏分离运动却像当年的朱毛红军一样，谋生存图发展，一步一个脚印，成功地实现了西藏问题国际化，争取到了各种国际力量的同情与支持，从默默无闻的一群丧家之犬到今天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达赖本人也成了大多数藏民和西方白领们心中真正的活佛，获得了西方世界一边倒的支持。随着同时代风云人物与他们事业的纷纷终结，达赖喇嘛凭借藏传佛教格鲁派首席精神领袖和诺奖得主的特殊身份，依然活跃在当今世界政治舞台上。绝对称得上是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一棵常青树。

在印度的支持下，达赖流亡政府的活动在全世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流亡政府的影响活动终于在国际社会形成燎原之势。其成功不说是绝后，至少是空前。让西藏问题引起世界舆论和组织的关注和支持不说，人家还在五、六十年代促使联合国通过了三项有关支持西藏自决的决议。八十年代，达赖喇嘛又发表了所谓西藏地位问题的"五点计划"，在认为西藏历史上即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基础上，提出"使整个西藏成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一个'和平区'和'缓冲国'"的方案。后来又提出了有名的"斯特拉斯堡七点新建议"，宣扬在西藏变成缓冲国之前，"西藏应当成为一个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自治的政治实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联盟'的关系"，"中国可继续负责西藏的外交事务，并在西藏保留有限数量的防御性军事设施，直到召开一次地区性和平会议使西藏成为一个中立化和平地区为止"，也就是后来"中间道路"的雏形。九十年代达赖又提出了"人民公决"的设想——即由全体藏人对决定西藏前途命运的四种主要方案进行投票表决，为西藏确定一条未来道路。四种方案分别为："西藏独立"、"中间道路"、"自治道路"和"正义事业运动"。所有这一切的提出，是否和阿三幕后操纵有什么关系不知道，但所有的提案内容都对阿三有利。

过去中央政府对西藏流亡运动的态度异常鲜明，就一个"剿"字。为什么三十六计一招也用不上，还是故意不用，叫人费解。1973年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访华期间，毛泽东就一再催促尼方尽快肃清其境内的西藏流亡运动的军事力量。1974年7月尼泊尔政府军开始包围进剿木斯塘营地，俘虏了大批西藏流亡运动追随者，最后一任木斯塘叛军司令旺堆嘉措也在突围去印度途中被尼泊尔军队击毙。前几天尼泊尔又逮捕了一批藏独分子，估计和中国有什么利益上的交换。

而印度的尼赫鲁根本不理老毛这一套，不但不"剿"，还专门和老毛对着干，一开始是默认流亡藏民的武装活动，1960年9月，达赖集团在尼泊尔木斯塘重新组建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在中国边境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军事袭扰活动，其首任总指挥在其回忆录《四水六岗》中写道，"组织了一系列向中国哨所的进攻"，"有时，一二百人的西藏游击队的活动深入中国占领区达一百英里"。1962 年，尼赫鲁干脆在印度建立起了基本由藏人组成的"印藏边境特种部队"（见小资料：印藏边境特种部队），从此流亡藏民有了自己的武装，也给醉心暴力方式解决问题的藏青会那帮小子们吃

了一粒壮阳丸。

小资料：印藏特种边境部队

在印度陆军的编制中，有一支主要由流亡藏人组成的"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是西藏流亡政权可资利用的武装力量。1962 年中印边境战争结束后，印度政府开始酝酿组建印藏特种边境部队。1962 年 11 月 14 日，西藏流亡政权在印度内政部调查分析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正式组建了印藏特种边境部队，由西藏流亡政权负责兵员来源，美国负责提供武器装备和部分经费并协助训练，印度负责组编、供应和直接指挥。这支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以印军"第二十二建制"闻名于世。印藏特种边境部队隶属印度内政部保安局，现有 81 个连队，其中藏人连队 69 个，廓尔喀连队 12 个，实力约有 1 万人，其规模相当于印度陆军师的建制。编为总部(设总监和副总监)、建制司令部(设司令和副司令)、防区和训练中心。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最高编制为营，每个营辖六个连。连为基本战术单位，各战斗连的编制人数一般为 120 人，多数连队缺编，不足百人。连、排基本上是"四四编制"，即连下辖四个排，排下辖四个班。营长都由军衔相当于印度陆军中校的藏人担任，连长由藏人少校或上尉担任。女性也可加入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但一般在通信和医疗部门服役。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总监(准将军衔)由印度人担任，副总监及其以下军官多由藏人担任，但部队实权掌握在印度军官手中。

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总部设在新德里，建制司令部设在距北方邦达拉顿市以北 100 公里的恰克拉塔。恰克拉塔是喜马拉雅山南麓一座小镇，也是流印藏人聚居区之一。那里有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大型训练基地，此外，在萨哈兰普尔、加拉顿和加尔各答都有小型的训练基地。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多数部署在印度边境特别是印中边境一线，少数部署在克什米尔锡亚琴冰川地区。部署在印中边境一线的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共划分有五个防区，五个防区司令部的驻地相对固定，但所辖连队不固定。防区内各连队每三年和后方基地的连队轮换一次。目前，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不仅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安置高灵感度的侦察设备监视中国军队动向，而且经常对中国实施有限的越境侦察行动。

这支部队还多次举行以中国边防军和西藏纵深地区交通线等重要设施为袭扰破坏目标的演练，有时还参加印军举行的各种实兵演习。此外，西藏流亡政权还经常向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宣传组建部队的目的是为了"西藏人民的利益"，为了实现"西藏独立"，煽动官兵仇华反汉的民族情绪，竭力培养他们的"藏独"意识。

1971 年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印藏特种边境部队被投入战斗。同年 10 月底，该部队主力被派往米佐拉姆。在一次代号为"鹰"的进攻战斗中，藏人副司令(准将)亲自指挥了整个作战过程，得到了印度政府的高度赞扬。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印藏特种边境部队被赋予几项重要的作战任务，包括破坏卡普台大坝和其它的重要桥梁。在此次战争中，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曾成功狙击了一支企图向缅甸逃窜的东巴基斯坦部队，并且迟滞了巴基斯坦第九十七旅和第二突击营在奇塔贡山区的作战行动。截止 1971 年 12 月 17 日印巴停火协定签署时，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有 56 人阵亡，190 人受伤。由于作战英勇，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有 580 名军人获得了印度政府的"现金奖励"。

在 1977 年印度国内大选期间，印度安全部门领导人派 500 名印藏特种边境部队突击队员前往萨拉沙瓦应对危安分子可能发起的骚暴乱活动。印度总理甘地被刺身亡后，印藏特种边境部队也用来保护印度总理。

阿三对待达赖流亡政府的做法也非常巧妙，阿三并不支持流亡政府在印度境内的活动，而是以达兰萨拉作为海外流亡活动的大本营，让达赖走进西方，走向世界。据报道，在印藏人不管是第几代生活在印度，都不能加入当地国籍，永远只能是难民身份，不能拥有土地和不动产，也不能永久性地购买和拥有土地及房产，一切都只能靠"借与租"。所以，流亡藏民并没有和阿三发生宗教、文化和民族大的冲突，对印度社会稳定影响不大。印度国家安全顾问纳拉亚南在 08 年 3 月 30 日与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通电话时表示，"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印方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从事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印度过去、现在、将来都坚持这一立场，不会改变。"注意，人家只是说了"印方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从事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阿三这么做，分明是把祸水引向西方，让红海洋对西方世界说不，让中国人有气冲着好莱坞性感明星、CNN 主持人撒去，这不能不说是阿三的又一智慧。

对待中国政府，阿三的态度和李铁梅差不多，不怕你抓，不怕你放，不怕你打，不怕你谈，整个就是一个滚刀肉。什么王顾左右而言他、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掺沙子扔石头、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当面喊万岁背后捅刀子这些人家都会。我就纳闷儿，老毛收拾老蒋、少奇、林彪那么多花样，怎么在这里一招也用不上。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幻，人家阿三始终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死死捏住西藏这颗睾丸，50 年来没有过任何动摇。看看下面这段印度总理辛格今年 1 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讲话，人家说得多好，好像达兰萨拉不是在印度、流亡政府跟阿三没什么关系一样。

"我们的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可能是来自于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包括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或借口清算历史的。最近在我们周边发生的事情再次说明我们有必要一起行动，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我们两国的社会大而多元，我们恰好有条件能够向人们展示温和不极端以及和平共处的好处。非国家实体的出现通常是建立在不宽容和对身份的狭隘认识基础之上的，这对所有的文明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威胁。"

藏民的宗教意识完全不同于我们的"早晚一炷香，晨昏三磕头"，即使是西方国家中宗教情节最浓的美国，虽然人们在公开场合愿意显示自己信奉宗教，但是很多人并不一定是真正的教徒。他们可能认同某些宗教的道德理念，但并不见得接受其他信条，而藏人的宗教几乎是原教旨主义。在西藏中共现在陷入了这样的怪圈，如果允许宗教信仰自由就一定会产生宗教领袖，当宗教领袖与北京意见不一致时候藏民一定会与北京决裂。要解决西藏问题，最见效的办法取消或限制西藏的宗教自由，而改革开放已经到了这般时分，这样做恐怕不太可能。

再一个方法就是"拖死达赖"，将来再找到一个听北京话的或者根本不参与政治的、只管开光摸顶的宗教领袖。还有一招就是这次全球爱国大游行时打出的标语"同化藏人"，实际上就是把藏人拖入世俗主义的泥潭，最后佛教对于藏人也就跟今天基督教对于欧洲人一样了，更多的只是象征意义。18 世纪欧洲的哲学家曾经预言，随着自

由意识的觉醒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宗教情结会逐渐淡化，宗教对于人们的麻醉作用也会逐渐减弱。今天的欧洲就是这样的结果，但美国却是个相反的例子，科技比谁都发达，但宗教情结却是西方国家里面最重的。从流亡藏人的表现来看，短期内被同化的可能性不大。

流亡藏民从流亡海外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开始了对藏传佛教的传承与发扬，只要生命与肉体依然存在，他们就会自发自觉地弘扬自己的坚贞信仰，而且坚持自己的政治诉求。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他们干得最绝的是，你很难在政治意图与传统信仰之间画出一条清晰的界线来，在接受藏传佛教文化的同时，也就认同了他们的政治诉求。好像西方还没有出现过当年戴季陶的那种情况：举起你的左手接受藏传佛教文化，举起你的右手反对西藏高度自治。

藏传佛教原本仅局限于西藏、蒙古以及南亚各国，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很有限。随着达赖喇嘛以及西藏上层僧俗统治阶层的流亡海外，现在藏传佛教已经散播到西方世界各国，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中国政府和民间投资几百个亿在海外建的那些刻意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孔子学院。其实也不奇怪，就凭《论语》开篇的三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能吸引什么人？都是些毫无智力含量的大白话，实在是没有什么能吸引人的内容。

在国人眼里，达赖无疑是一只"披着僧袍的狼"，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但流亡政府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播，无疑是未来佛教历史上最动人的故事。随着藏传佛教在海外传播的成功，达兰萨拉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当今世界藏传佛教的圣地。在国际社会眼中，有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达兰萨拉在当今藏传佛教领域的地位恐怕比拉萨更加尊贵正统，其散布的教义也更能代表藏传佛教供奉的诸天神佛的不二法旨。

我现在吃惊的是达赖怎样征服西方世界的。我印象里达赖喇嘛没什么时间静坐沉思，一天到晚马不停蹄地在西方世界游说布道。他宣扬的佛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启蒙知识，每次演说的内容也大同小异，比网上那些佛学大师的小册子未必能高明到哪里去，做为佛教启蒙知识，起码我认为印光大师的东西就丝毫不逊色。但实际上达赖根本不是其他宗教领袖和职业政治家能够望其项背的。所到之处无不万人空巷不说，光是洋鬼子提起达赖那份兴奋，眼睛里放出的光彩，"我们见到了达赖"，就让人怀疑达赖究竟是人还是佛。

佛教与其它宗教不同，认为佛不是独一无二的，不像基督教，神是耶和华、耶稣、玛利亚，宗教领袖们再怎么折腾也就是个打杂的工作人员。伊斯兰教我一点不懂，只是在电影里看到教徒反复重复"主是安拉，穆罕默德是他的忠实使徒"，估计也差不多。而佛教则认为众生是未来的佛，佛是过去的众生。人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修养来成为觉悟者，也就是成佛。众生和佛的区别，是在于迷悟之分，迷则佛是众生，悟则众生即佛。所以将来达赖喇嘛是否算已经成佛，还有他在藏传佛教中的历史地位，还很难估计。

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阿三那块"陕北根据地"的功劳。达赖和其他佛学大师的区别，一个是他的悲情色彩，不在乎达赖说什么，他的处境、经历、他的那张脸就可以解释轮回和解脱的真谛；佛教有所谓"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众生要达到

成佛的境界，关键在于明心见性，而达赖的经历可以说就是这种明、见的认识活动。禅宗二祖慧可的立雪断臂，六祖慧能被四处追杀和今天达赖流亡的经历都是明心见性的资本；再有就是他对尘间浊世的关怀备至，什么环保、人权、反核都有达赖的声音，所以他享有许多佛学大师、宗教领袖和职业政治家可望而不可及的威望。

当年各国革命党闹革命时"唤起工农千百万"主要是靠利益，也就是"打到地主分田地"，承诺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天堂供人们享受。而藏传佛教秘术有些简直就是巫术，也就是前几天五骆驼网友说的密宗那些事，和我知道的情况差不多，并没有什么夸张。封闭、野蛮、原始的传统藏族社会统治习俗更是和西方社会的德先生赛先生格格不入，是怎么"唤起鬼子千百万"的，确实是个谜。西方社会崇尚竞争、思辨求真、积极入世、博爱共济的社会理念，和藏传佛教几乎毫无共同点，以基督教文明为绝对主导核心的西方社会和流亡政府更不是一回事，放在一起不死掐就不错了。

而实际情况却是西方人对这种我们认为是愚昧、落后、野蛮、反动的文明不但不反感，还个个露出难以名状的痴迷情节，听达赖一两次演讲便可成为终身的幸福。经典的解释是进入所谓后现代社会，人们在经历了长期的技术发展、经济繁荣和富裕生活之后，也发现了高度现代化带来的许多难以补救的社会弊端，西方民众自然地产生了对失落已久的和谐、宁静、甜美的田园诗般的中世纪西方生活的留恋。而号称世界第三极的西藏不仅地理位置独特，封闭，尚未受到现代化冲击，生活着相对与世隔绝却又十分知足自得的西藏民族，他们还有自己古老独特又神秘莫测的宗教传统。

这一切正好符合西方人对一个理想的、失落了的过去的构想。于是西藏在他们心目中变成了世界上最后的一块净土，变得如同伊甸园一般神秘诱人，他们自然而然地开始对那些最容易接触到的藏人产生莫名的同情与认同。人们所说的西藏是最后一块"西天净土"，追求反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界。一是说自然环境，二是说人们的生活方式。自然环境很多欧洲国家也都差不多，只是云彩没有西藏这么低，太阳没有这么近。而更吸引西方的，还是藏人的生活方式，包括现在很多内地成功人士去拉萨暂住，说白了就是那里的污染轻，人单纯，欲望少，可以傻傻地闲呆着，不干活不消费而没人嘲笑；可以不理什么金梭银梭，就这么鬼混一辈子，"当他回首往事，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因为在藏人眼里，芸芸众生的光阴只配这么虚度，青春只配这么蹉跎。

关于达赖对于藏传佛教，我想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达赖喇嘛对藏传佛教进行了改革，而且整个过程"悄悄地进村，打枪地不要"，"去粗取精"，向藏传佛教融入了很多现代文明的东西。这是我的想法，因为靠阴阳合体、剥皮点天灯、大便制蜜丸这一套是绝不会征服西方世界的，我甚至想，会不会将来达赖也将成为藏传佛教的马丁路德。

说印度捏住了西藏问题这个睾丸，不是没有根据。前边我说到的中国在锡金问题上的妥协，就是一个人家捏睾丸的例子。据官方的报道，中国在锡金立场的松动不是没有原因的，"在锡金问题上让步，凸显中国务实外交"。西藏问题和边界纠纷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印两国关系发展的两大障碍。印度政府长期以来纵容达赖等西藏分裂分子在印度活动，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边界问题在 1962 年中印边界冲

突后长期搁置，双方立场相距甚远。为了使中印关系有所突破，中印双方都做出了努力。印度方面在 2003 年主动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这个印度长期暧昧的问题上第一次表明了立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陈峰君教授认为，默认锡金为印度一部分就是对印度对这一表态的回报。

不过现在我对台湾和西藏问题的"捏睾丸学说"也感到不解，被人家捏睾丸本来应该疼痛才对，可现在一捏起来，全国上下都很亢奋，实事求是地讲，政府有时候还希望对手捏一下，可以转移注意力，增强凝聚力，加强党的领导，使很多无法解决的矛盾暂时缓解，特别是可以证明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堵住民主派的嘴。有时候愤青们提到台湾、西藏问题就不是"愤"而是莫名其妙的"奋"，按说我们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南北韩毕竟彼此承认，国际社会也作为两个国家考虑），动武没有实力，和平解决缺乏智慧，应该感到羞耻，至少应该不好意思才对。可我最近听了两次形势报告，都有台海形势的内容，都是大牌讲的，旁征博引，语言生动，最后的结论都是"在四代领导人的不懈努力下，我们粉碎了帝国主义的一次又一次阴谋，使台独不能得逞"，"我们又赢了一回"，此时便台下掌声雷动，与会者集体亢奋。

捏睾丸不但不疼痛，居然还捏出快感来了，有时明明人家还没动手这边就尖叫起来，这恐怕是西方社会绝对没有想到的。这可能就是老河说的"彼非其人何以知其思？"或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莫非这里面也有个"你们的睾丸和我们的睾丸"的问题，彼此间结构不同，我们的睾丸上还有 G 点？到底有没有兴奋点不可能用白箱的方法，而根据黑箱理论，通过输入刺激后看到的反应，只能得出肯定的结论来。

弱国也有外交

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弱国无外交。我看不一定，那得分对手是谁，朝鲜、越南、柬埔寨、老挝、尼泊尔、不丹哪个不比中国弱？可人家又有哪个没从中国捞过便宜。最邪乎的是中印边界自慰反击战之后，阿三永久占据了中国藏南最富饶的九万平方公里土地，给中国人脑神经留下了永久的痛，以至于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们的脑袋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是占位性病变还是供血不足，是需要手术还是保守治疗，治则应该是醒脑开窍还是镇静安神。

1962 年中国和印度发生的边界战争，中国打得极为漂亮，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志气，打出了骄傲，打出了快感，打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按毛左们的说法"中国的大国地位就是这样打出来的"。就当时看，中印边界战争胜利者和失败者是十分明确的。但是，经过了 46 年之后再来看那场战争及其结果，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就像人们说的，"胜利者除了没有失败的名义，却具备了失败者的一切；失败者除了没有胜利的名义，却得到了胜利者的一切。"，中国在 1962 年使用了武力，得了暴力之名，却还失去了藏南 9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三国演义》的那个三气周瑜的故事是罗贯中瞎编出来恶心刘皇叔对手的，根本没有什么"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可这次，我们确实是"输了道义又失地"。

建国以来，我们"妙计安天下"可是不善乎，经常以让地给钱的方式表现天朝大国的风度。1956 年 12 月，周恩来访巴占克什米尔，主动提出把新疆的坎巨提地区让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喜出望外，他们从未奢望过！此举明摆着会得罪印度，谁也不知道我们的脑袋是怎么想的！其后又以英国殖民主义者提出的、蒋介石拒不承认的 1941 年中缅边境条约，割让了数万平方公里领土给缅甸。

撒泼耍光棍，拿捏老毛，收拾中国人，朝鲜最在行。人家最懂得什么叫"有利有理有节"，什么叫"会哭会闹的孩子有糖吃"。1962 年，金日成以长白山是自己在日本殖民朝鲜时打游击的地方，希望中国能了解朝鲜人民对此地的革命感情，将长白山划给朝鲜。当时中苏翻脸，在共产国际里很孤立，为争取朝鲜成为反苏盟友，中国居然同意把长白山的一角（有说是 1/2，另个说法是 53%）和八个山峰中的三个划给了朝鲜。前几年我去过朝鲜一趟，发现我们虽然给钱给地又死人，可金家的子民们根本不领情，而且人家的理由很充分：你们口口声声说朝鲜是中国的东大门，我们抗击美帝就是给你们站岗放哨，没有朝鲜中国早就亡国了！这可是你们中国人的理论啊。

中国外交实际上是承传古代的规则：朝贡制度。"天子"把自己视为"天上帝国"，而把其它"蛮夷"国家纳入帝国的贸易、文化和政治体系。通常是蛮夷带点土特产，就可以从天国手里套现大把的银子。到了老毛手里只是又加了些政治因素，有一些新的创意。最有创意的，当属 1962 年中国和尼泊尔谈判边界。为了与印度争当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龙头老大，北京对这位毫无谈判实力的国王，送上如此重礼--部分喜马拉雅山。毛主席指出：珠峰举世闻名，中国和尼泊尔单独拥有都不好。最好是一家一半，让它成为边界之峰，友谊之峰。这些话都收在了老一辈无产阶级外交家的回忆录里，人们认为这就是机智幽默、胸襟气魄。后来中国和巴基斯坦谈判边界问题时，巴基斯坦援引珠穆朗玛峰的先例，和尚动的、我何动不的，把喀喇昆仑山的主峰乔戈里峰（即西方登山界所称的 K2，海拔 8611 米，世界第二高峰）割走了一半。实际上，很多国家就是认为中国不公平，给自己的不如别人多而和中国掉歪歪。多少"边界之峰，友谊之峰"、"边界之河，友谊之河"、"边界之地，友谊之地"，就这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就这样，中国与邻国的边境条约，没有一个不是以让地给钱的方式签订的，以此来挽回一个和平的国际形象。最不可思议的是中印边界，牺牲了那么多生命，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落了个暴力的恶名，却白送九万平方公里西藏最好的土地给印度，令全世界想不通。难怪 1975 年 5 月邓小平访问法国时，德斯坦总统也对我们的领土政策感到十分不可理解。

导致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中印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这方面的资料很多，这里就不详细说明了。印度的基本方针很明确，也很实用，就是对凡是有争议的、老袁老蒋没有让步的、他们认为应该是属于印度的土地进行毫不留情的蚕食。"蚕食一点，舒服一点；蚕食的多，舒服的多，完全蚕食，彻底舒服。""蚕食吧，蚕食个十年八年，问题就解决了。"（小青年可能不知道，这些话都是改编自《毛主席语录》）

鉴于中印在边界问题上的根本分歧，1959 年 1 月 23 日，周恩来致函尼赫鲁，指出

中印边界从来未经正式划定，中方建议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在全面解决之前，双方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对于已经发生的局部争执，可以商谈临时性的解决办法。3 月 22 日尼赫鲁复信，坚决不同意周恩来的说法，要求中国正式承认英国统治印度时期英国殖民者与西藏地方政府私自签订的麦克马洪边界线，强调印度地图上所标明的边界线（指麦克马洪线）"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实实在在表演了一次弱国可以对强国说不。

1962 年 10 月 20 日，中印边界开打。战争爆发后，印军一溃千里，狼狈不堪。这时候，阿三开始显示出大智慧，让人认识了一下弱国外交。开战后尼赫鲁马上呼吁中国的前老大哥苏联介入冲突，并开始公开请求西方国家的军事援助。尼赫鲁致函肯尼迪声称："在此危急关头，我自信将得到您的同情和支持。"由于印度拒绝中国方面的停火建议，11 月 2 日，中国军队对印军展开第二轮打击，尼赫鲁在没有同内阁商量的情况下，连续给肯尼迪发出两封急信，呼吁美国同印度结成同盟，干预中印边界冲突，并希望美国直接参加战斗。

中印边界冲突开始后，美国和英国立即做出反应支持印度。美国不仅向印度提供了紧急军援，而且还提供有关中国军事行动的情报。与此同时，12 架 C-130 大型运输机赶赴印度，帮助把克什米尔前线的印度士兵运往东部。为进一步表明对印度的支持，肯尼迪指示加尔布雷斯大使发表声明，支持印度对有争议领土的要求，承认"麦克马洪线"为约定俗成的国际边界线。11 月 14 日，印度和美国在华盛顿签署了美国军事援助印度的协议。英国对待中印边界冲突的态度也是强硬和明确的。1962 年 10 月 22 日，英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英国"一向承认麦克马洪线是印度的边界，并且当然继续这样做"。英国还向印度提供了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国家援助印度的第一批军火物资。

在得到英美外交上的支持和军事援助的保证以后，尼赫鲁力图最大限度地得到苏联的支持，而苏联也试图发挥自己的影响，苏印关系在边界冲突期间迅速发展。苏联的有关政策立场，在 1963 年 5 月 17 日契尔沃年科致苏共中央的信函中表现地极为明确和充分。契尔沃年科在这一政治信函强调：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作为亚洲最大的中立国家的印度，是中国在亚洲大陆争夺领导地位的最大障碍，于是便企图利用边界冲突，称印度已不再是不结盟的中立国家，以此损害印度的声誉。因此，苏共中央领导人相信，中国人进攻的是不结盟运动，而不是印度。中国人这样做是想让赫鲁晓夫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相信，尼赫鲁所倡导的不结盟的思想是虚伪的和毫无价值的。中国人相信，只要在这个时候推印度一下，整个不结盟的大厦就会坍塌，尼赫鲁就会从美帝国主义那里寻求保护。苏共中央领导人还明确指出，中国对印度的进攻，是中共同其他共产党之间的巨大争论的突出表现，即对不结盟运动和和平共处的不同认识。

由于尼赫鲁的不懈努力下，国际社会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印度。在冲突中公开表示支持中国的只有越南、朝鲜、缅甸和巴基斯坦等为数不多、影响力可忽略不计的国家。公开反对中国的行动，同情和支持印度的共有 75 个国家。出于外交上的考虑，1962 年 11 月 22 日零时，正在乘胜追击的中国军队突然停止攻击，并从 12 月 1 日起，从 1959 年 11 月 7 日从实际控制线后撤 20 公里。中印边界冲突以"让全世界大吃一惊"的方式结束了。

赫鲁晓夫当时就发懵，问人民的好总理说："中国单方面停火、后撤，当然很好，但是，中国部队当时不从原有阵地前进，岂不更好？"人们常说好地不长草，聪明的脑袋不长毛，看来还是有一定的道理。至少这件事情上，赫秃子比我们清楚，可能与秃顶接受更多的紫外线照射有关系吧。

其实不光赫鲁晓夫不明白，别人也不明白，但都以为主席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只是几十年了还没见老人家和继任者落子。我们现在一说就是毛主席"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我怎么看到的净是些让地给钱的记录，至于说到收复失地，我用放大镜找了一圈连一毫米都没发现，用光学显微镜搜了一遍，也未发现老毛收复了哪怕一微米的土地，各位在国外，仪器设备先进，用电子显微镜再找一下试试，哪怕有纳米级的发现告诉我，我也会像那位在广寒宫酒吧，和直荀哥哥一边呷着大堂经理吴刚送上的桂花酒，一边欣赏嫦娥性感组合跳钢管舞的开慧女士一样，"忽报老毛收寸土，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断子绝孙的阿三！

1962 年中印边界冲突导致南亚的战略格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62 年中印边界冲突后，在印度同美国的关系迅速发展的同时，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结束后大力发展同印度的关系，这无疑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虽然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印边界冲突"主要是通过斗争达到团结，使尼赫鲁愿意谈判，来划一条比较永久的和平的边界线，使我们安静一方，安静西南边界，集中力量对付东边，我们的战略是以美国为主。"但在中美敌对和中苏关系破裂的情况下，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后大力发展同印度的关系，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内的合作，无疑对中国的国家安全特别是中国南部边界安全构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和相当严重的威胁。当时中国解除这种威胁的办法很简单，还是以传统的让地给钱的方式，具体说就是默认印度向藏南移民，来换得"北紧南松"。

在财富层面上，阿三代表的是穷国；在制度层面上，阿三代表的是民主；在文化层面上，阿三代表的又是东方文化。让西服革履油头粉面的江泽民胡锦涛和留着长胡子包着头巾的辛格站在一起，大概谁都会得出这个结论。现在好像已经形成了定式，不管是谁，只要和中国关系出了问题，马上就去拉拢阿三。若是穷国，便强调都是发展中国家，"穷不帮穷谁帮穷，两颗苦瓜一根藤"；若是富国，就要强调共同的民主自由价值观，"若为自由故，一切皆可抛"。

像前几年那个生瓜蛋子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要 250 参拜靖国神社，国内组织反日大游行，中日关系交恶，受益最大的就是阿三。前年安倍上台，又去访问印度，安倍发自肺腑地说："这一伙伴关系是一种联盟，我们拥有自由、民主和尊重基本人权等共同的根本价值观以及战略利益。"安倍还提出要建美日澳印为核心的"亚太自由之弧"，以意识形态笼络印度，遏制中国。然而印度热衷经贸合作，对安倍的军事合作，阿三有一搭无一搭，重点还是盯住日本人的钱袋。印度在和美日进行联合军演后，印度海军 08 年又分别与中、俄举行军事演习，印度完全懂得夹缝中求生存的道理，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

而且阿三不管什么中国抗议不抗议，应安倍的要求，专门安排安倍晋三在印度会见拉达宾诺德•帕尔的儿子。帕尔是二战后审判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的印度法官，主张"日本战犯均无罪"。安倍在印度公开对帕尔大加赞扬，安倍称，帕尔当时在战胜国对战败国的"事后审判"中提出质疑，主张被告人全部无罪，"许多日本人至今还很钦佩帕尔法官的勇气"。看来"日本国土小，心眼也小"的说法确实有一定道理。当时日本国内对此捏着一把汗，怕中韩抗议，但至今也未见中国政府和爱国青年有什么动静。

中印边界冲突后面的事情，阿三干得更漂亮。1962 年 10 月的中印战争后，阿三虽然大败，但在中国军队悉数撤回后，印度人开始向那里大量移民，耕作建设，繁衍生息，已成了六、七百万新一代印度人唯一的"家"。到现在藏南已由印度实际控制了近五十年，并早已将藏南更名为阿鲁纳恰尔邦（Arunachal Pradesh，又译阿鲁纳查尔邦）。维基百科全书关于"藏南"的条目是这样写的：

"藏南属于西藏的一部分，并且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为西藏自治区的下属地区。中印边境战争之后，主体为印度控制，并且现在为阿鲁纳恰尔邦。"

解放军作家金辉对藏南那片土地这样换算：
——相当于一个江苏省、一个浙江省；
——相当于三个台湾、六个北京；
——相当于一个匈牙利、两个丹麦、三个比利时；
——相当于六个科威特；
——相当于十个英阿争议的马尔维纳斯群岛；
——相当于二十个日俄吵得不可开交的北方四岛；
——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一国被另一国强行侵占的最大一片土地；
——是中国版图的一百零一分之一。

这是一段任何人都承认的事实，毛左们提起这段，无非就是找些借口："后勤保障困难"、"易攻难守"、"缓解来自北边的压力"、"北紧南松"等等。甚至还有人提出了"不要怕阿三打碎我们的坛坛罐罐"、"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使我想起 70 年代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的台词：墨索里尼总是有理，过去有理，现在有理，将来还是有理！

由于我们的失策，竟做成了连麦克马洪也无法做到的事，永远丢掉了这片国土！据说，国际上有以下规定：一国占据某地 50 年以上，国际上就承认该国对这一地区的合法拥有权。藏南，这片 9 万平方公里肥沃而富饶的土地，看来已经永远失去了。中国陆地的面积只有 951 万平方公里，根本不是国人常说的 960 万平方公里，这是一个除了中国以外世界各国都承认的一个事实。

中国丢失了藏南地区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以至于连军旅作家都可以这么肆无忌惮地写出来，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还要坚持"国土面积 960 万平方公里"的荒谬说法呢？我认为实际上这是一种"舍真求荣"做法，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还想专门撰文谈谈这个问题。毛时代我们不仅仅是"舍真求荣"，甚至还"舍利求荣"、"舍命求荣"，现在政府最大的进步就是不再"舍利求荣"、"舍命求荣"，但"舍真求荣"还是必

须坚持的，否则就没有办法在民众中混下去。时至今日，中国人作为个人，往往是考虑国家大事时，还是要求政府和别人不但要"舍真求荣"，甚至还要"舍利求荣"、"舍命求荣"，但处理个人事务，则进步了很多，往往是"舍荣求利"，时时处处事事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不能不说是部分恢复了趋利避害的本能，这种进步乃是"人类一小步，中国大飞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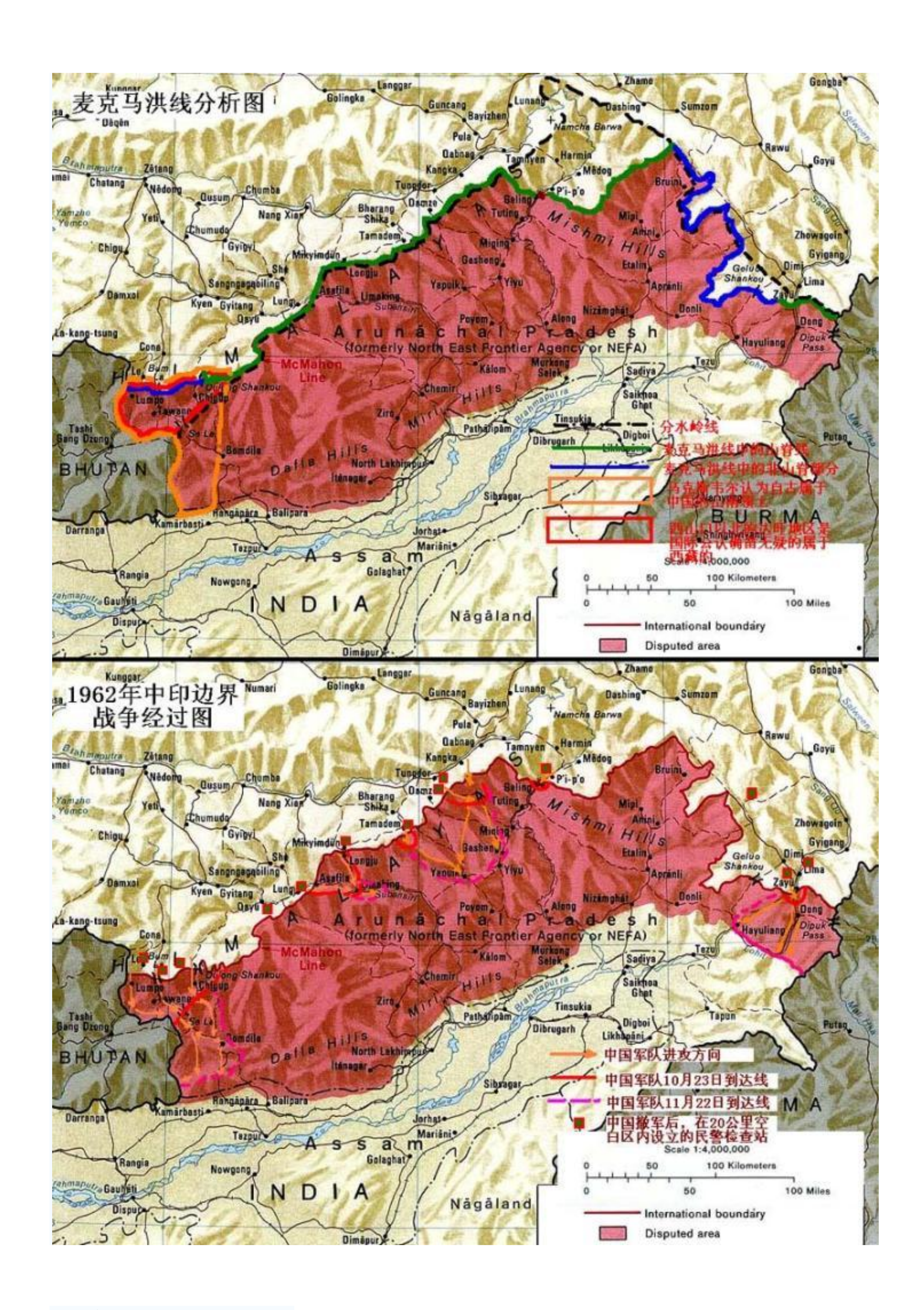
我认为在藏南地区，即使国际上没有这个 50 年规定，中国政府对付那帮几百万的移民，也是"办法的绝对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还是没有！过去咱们还嘴上喊一喊，如 1986 年 12 月 12 日《人民日报》称："...印度当局企图通过国内立法使它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合法化，这完全是徒劳的，由此而带来的后果也是严重的。"现在则连提都不敢提了，更谈不到什么"后果也是严重的"。

我死也想不通，为什么老毛收拾老蒋、少奇、林彪那么多花样，什么引蛇出洞、后发制人、掺沙子扔石头、九个指头对一个指头、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刨去是非曲直不说，就手段来讲确实是高超，称得上是招招致命、刀刀见血，十步一杀人、千里不留行。奇怪的是对付阿三怎么一招也用不上，难道藏南就这么拱手交给阿三了？如果藏南让两个超级大国拿去也就算了，没想到这次让这个素来被我们瞧不上的阿三沾了便宜，阿三一定会觉得"自己大指拇和第二个指拇有点古怪，仿佛比平常滑腻些"，想到这我就气不打一出来，这断子绝孙（die sonless）的阿三！。

小资料

下面这个资料，让大家了解一下至今被战败国印度占领的神圣国土的情况

在东经 92 度至 97 度之间的约 9 万多平方公里的喜马拉雅山脉南坡，有一块被中国放弃的土地，是比西藏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富饶的风水宝地，不要以为这里属喜马拉雅山脉就尽是些冰雪满野的荒漠。在夏季，由于迎着从印度洋上吹送来带着大量水分和热量的西南季风，这里温暖而多雨，年平均降水在 9000 毫米以上！是世界上降水量最大的地区之一，可种植许多亚热带作物，肥沃得有西藏的"江南"之称。那一片那里土地极其肥沃。植物茂盛，能够生长菠萝香蕉。自然景观奇异。矿产丰富雅鲁藏布江著名的"大拐弯"，可利用的落差 2230 米，如果横切大拐弯建一条 40 公里长的引水隧道，可建成世界最大的水电站，装机容量最低为 4500 万千瓦以上，是长江葛洲坝电站的 17 倍，是三峡电站的 4 倍投资却比三峡低得多，又没有移民、生态、战争灾难一类的问题。然而，这个设想中激动人心的超级水电站，却被"麦克马洪线"拦腰切断。这片土地，是西藏人民历代居住的土地，是西藏气候最好、物产最丰富的一片宝地，然而这片领土却被我们随随便便地丢掉了。



愤愤们为什么不去惹阿三？

首先还得说几句什么是愤青。愤青的全称是"愤怒青年"，国内有个关于愤青的顺口溜，我附在后面。其实细观察就会发现，在多数情况下愤青们并不"愤怒"而是"亢奋"，而且愤愤们的组成各个年龄段都有，从人数上看当然是青年为主，但"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愤老学者也不少，这些人"愤"量重，而且愤老们最大的特点是好为人师，彼此之间为争当愤愤们的精神领袖打得不可开交。凡是愤青们取得一点成绩，都宣称是自己正确领导或引导的结果，都认为是自己关键时刻的某个发言或贴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若没有达到预期结果，一定是对愤老指示贯彻执行不力所致。

在中外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今日愤青这样的等价物或类似物。

一提起愤青，我看到的类比，常常是义和团、五四青年、红卫兵、韩愤，偶尔也有说古代名士的。其实细分析一下，并不一样，区别甚大。义和团是由没文化的农民构成，明显带有一种抵制现代文明的倾向，方式尽管可笑，但人家可是誓死捍卫中华文化价值。其所作所为倒是和塔利班相似。而现代愤青们都有很高的学历，硕士博士在愤青中所占比例远远超过农民工。因为工作关系，我和建筑工人有不少接触，他们的革命热情和对时事关心的程度远不及博士生，一说台湾独立就是关我球事。而博士生们却是一提起这类事情来就亢奋，好像智取威虎山里的李勇奇一样，人人心头一把火，争着去打台湾岛。而且每个人都有一套极为成熟、实用的作战方案，至于攻打台湾的理由，居然出奇地一致：不拿下台湾，大陆就没有出海口。

和义和团的师兄弟们不同，愤青们看似愚不可及，实际上却高明，人家从来不干义和团杀洋毛子传教士那样的蠢事。若遇到老外，大概首先要考虑的还是能不能可以抓来当个推荐人、保证人什么的。即使对于二毛子，当代愤青也做到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主要手段是泼粪，昔日赵薇和今日王千源都是这么给恶心了一下。至于古代的名士狂士，时髦的做法是"仰天大笑出门去"，远离尘俗，隐身于山林寺庙，从不干泼粪之类的事情。古代狂士话虽然说得很大，但对现实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现代愤青行事的准则是下可以哗众、上可以邀宠，所以成了任何有头脑的执政者不能忽视的一种力量。

愤青们和红卫兵也不一样，红卫兵都是些有革命理想、勇于献身的热血青年，讲究的是一切让毛主席满意，让毛主席放心，目标是"Free All Mankind"，让世界山河一片红。后来他们挨整，一部分红卫兵成了阶下囚，文革后还有一部分成了三种人，主要问题是弄不清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哪儿。而现代愤青根本不必有这种担忧，他们的心和中央是相通的。当年红卫兵是"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只要毛主席挥挥手，"不管前边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义无返顾，勇往直前"（朱镕基语）。但现代愤青却精于算计，砸日货，要砸别家的日货；砸大使馆，前提是必须不影响出国。满嘴的反美反日，一肚子签证绿卡。愤而不乱，从来没有过方寸大乱的时候。

我认为在民主自由人权的西方世界里大搞爱国运动不能不说是人民群众的一个伟大创举，比起毛时代来要聪明许多。以前老毛是对第三世界输出革命，毁了不少华人华侨。那些第三世界的独裁者们不管这一套，只要对政权有威胁就大开杀戒，一弄就是几十万人头落地。而且不用政府动手，只要给个舆论导向，当地百姓自己就有冤的伸冤，有仇的报仇，把一切搞掂。六十年代印尼、缅甸等国家无一例外，都是

这样处理的。

今后海外华人该怎么定义，还真是个难题。以前周总理用通俗的话解释说，华侨一旦成为所在国的公民，就象嫁出去的女儿一样，成了婆家的人，应该和新家中的人友好和睦相处。同时，也是中国的亲戚，应该成为两国间友好交往的纽带。可实际上，女儿在婆家真受了欺负，娘家人根本不出面。六十年代印尼发生九州军事政变，中国被怀疑是幕后策划者，因而印尼掀起排华浪潮，逾 30 万名华侨遭杀害，更有无数华人逃往海外，或留在印尼沦为"难民"和"无国籍人士"。杀便杀了，也未见咋地。

在 49 年以前，海外华人自己没"嫁出去的女儿"这个概念，像毛泽东对共产党员的要求一样，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打成一片，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平时在居住国认认真真做人，规规矩矩干事，闷头发财，讨生活。一旦出了事，能跑便跑，谁也想不到娘家人还可以出来说话。像印尼是荷兰殖民地的时候，中国人已经从事着各种职业，如办事员、经纪人、零售商、佃农、耕种者或仆人等，甚至连种植甘蔗这种给黑奴干的活都干，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有做大买卖发了财的。中国人的数量和取得的成功让荷兰人感到恐惧。1740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听到反叛的传闻后对中国人进行了一场大屠杀，大约有 2 万到 3 万中国人因此丧生。荷兰害怕中国皇帝会对其在广州的荷兰人进行报复，于是派了使团前往中国说明事由，并为此道歉。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当时的中国皇帝乾隆竟然毫不介意地答复说："我对于这些远离祖国贪图发财，舍弃自己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的关怀！"

现代中国愤青虽然和红卫兵在献身精神方面不能比，韩愤倒是和红卫兵有些像。记得当年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有几个韩愤到日本驻韩大使馆门口切小指头抗议，切掉没有不知道，反正是血乎次拉的，后来好像还有切腹的。当时网上对棒子赞不绝口，说高丽民族有血性、真男儿之类的贴子满天飞，网上中国愤青还号召向韩愤学习，结果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最后也没听说谁这么干了，很是教韩愤看不起。其实大家都希望有人去干，自己在一旁助威呐喊，问题是大家都这么想，谁也不比谁傻。

至于民国的愤青，老芦在《我们的爱国与前辈的爱国》中说得已经非常清楚了，张国焘们人家玩的是火烧赵家楼、痛打外交部长，不是像今天的愤青一样与政府高度默契，说一些政府不便说的话，干一些政府不便出面干的事，有些是政府组织的，有些是和政府唱红黑脸，演双簧，你方唱罢我登场。比如最近的铁公鸡排行榜，为什么都在肯德基门口闹事，在那么多铁公鸡里面唯独没有日企，难道和锦涛书记前些日子的"暖春之旅"无关，鬼才相信。而且我的手机接到铁公鸡排行榜短信 5 天后政府才出来辟谣，既然是谣言，为什么不早辟谣？愤青此举完全是想政府之所想，急政府之所急，替政府催缴捐款，客观上为这次捐款立下汗马功劳。更重要的是它的震摄效果和远期效应，以后谁不捐款就恶心谁，把政府乐得前仰后合。

对于政府来说，愤青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可以转移注意力，绑架中国。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广大群众关心的问题，是诸如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生态破坏等国内问题。这显然不是 CNN 节目主持人或好莱坞脱星的一句话造成的。中国一个堂堂大国，在目前毫无战争危险的情况下，正像老邓讲的那样，关键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在国内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愤青们在虚拟的世界里对西方冲锋陷阵，杀

声四起，好像由于西方世界的原因，中国马上就面临亡国灭种之灾一般。对于国内，愤青们高举的是爱国大旗，对观点不同者尤其是主张向西方文明学习者进行道德绑架，一顶汉奸走狗的帽子扔过去，便可将一切搞掂。

至于说什么愤青做法有损国际形象、影响投资之类的话在国内没人爱听，谁都知道外企来中国投资是因为这里劳动力性价比极高，绝对为世界之最。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有这样多的国民，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和血。而且还可以偷税漏税洗黑钱，也不用考虑什么环境污染，绝对是投资者的天堂。通过这次家乐福和铁公鸡排行榜这两件事，国内现在普遍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世界 500 强敢情都是一群纸老虎，不刺激它要赖在中国，刺激它也要赖在中国，赶都赶不走，不敲白不敲，敲一笔算一笔。

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别的国家"，有如此好的投资环境，可以这样自由剥削任意解雇工人。举个例子，今年世界上对船舶的需求量剧增，三个造船大国日本、韩国和中国都接到了超过自己生产能力的订单。日本和韩国都缩手缩脚的不敢接单，像个小脚女人，因为他们面临的问题是扩大再生产容易，但将来需求量萎缩可怎么打发这些工人。中国根本不用考虑这些，城市来的回家吃低保，农村来的回家接着种责任田便是。这些工人也会很知足，总比一直在家里呆着强啊，是不是？

要说政府和愤青完全一致，也不是。我在前边说过，现在政府最大的进步就是不再"舍利求荣"、"舍命求荣"，但"舍真求荣"还是必须坚持的，否则就没有办法在民众中混下去。这不能不说是"人类一小步，中国大飞跃"。过去我们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现在不过是抓起白灰抹自己的脸，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而愤青在考虑国家大事时，还是要求政府不但要"舍真求荣"，甚至还要"舍利求荣"、"舍命求荣"，但愤青们大都欺软怕硬，根本没有挑战政府的勇气，一旦政府发出"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是爱国"的信号，就会非常识相地偃旗息鼓，暂时休养生息，以利再战。至于愤愤们会不会有朝一日逼着政府"舍利求荣"、"舍命求荣"，还要看政府功能的弱化程度。

小资料

关于愤青的一个顺口溜：
愤青是误国的，大家是公认的，
年龄是很小的，读书是很少的，
头脑是简单的，思维是混乱的，
知识是贫乏的，思想是幼稚的，
判断是总错的，碰壁是经常的，
吃亏是较多的，经常是愤怒的，
脾气是爆燥的，心情是郁闷的，
态度是无理的，开口是很脏的，
自称是爱国的，本质是自私的，
民主是不懂的，公理是不讲的，
反美是盲目的，保萨是乱说的，
作用是当枪的，指哪是打哪的，

心态是冲动的，一点是就着的，
经验是不多的，受骗是必然的，
调教是容易的，上面是喜欢的，
大脑是进水的，好坏是不分的，
感觉是良好的，精神是阿 Q 的，
于国是有害的，于己是不利的，
前途是不大的，长大是后悔的。

说到愤愤们为什么不去惹阿三，铁木网友认为搞阿三没快感，这句话有点道理，但也不尽然。就从"有快感、不伤身"的角度看，搞阿三确实欠了点，弄美国又怕伤身，最理想的应该是玩日本。首先小泉纯一郎这个混小子确实不地道，像参拜靖国神社这种事情不管有什么理由（如为了选票），实际结果就是挑衅，成心要戳中国政府的面子，挑战中国的底线。再就是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在历史上又欺负过中国，所以收拾小鬼子肯定有快感；而日本又是个战败国，一无军队二无核武，国土狭窄无战略纵深，经济上对外尤其是对中国的依赖性又很强，所以不会伤身。综合考虑，收拾小鬼子确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认为日本在处理外交问题上非常失败，别看那些政客们个个衣着鲜亮，比披着沙丽、缠着头巾的下贱阿三差了一大截。日本人的毛病，简单说就是该硬的时候不硬，不该硬的时候瞎硬；没事的时候爱惹事，惹出事来又怕事。无论对待美国和中国，都是一样德行。像日本经济超过美国的 80 年代中期，一下子又跟当年偷袭珍珠港得手一样飘飘然，忘记了自己这个半导体推销员应该吃几碗干饭，首相中曾根康宏居然说"美国没有能力使其多种族社会取得更大进步是因为存在少数民族，如有色人种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人"，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弄得美国举国愤怒，中曾根不得不向美国道歉。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也是一样，动不动就跳出来个二百五大臣，说点敏感话题，然后中方抗议，大臣下台，首相道歉，再搭上大把日元。隔一段时间就要来一次，叫人很看不上眼不说，还又能最大限度的刺激愤青们的 G 点，你说不收拾小鬼子收拾谁。

阿三虽然对西方世界的依赖性非常高，但人家并不是像日本似的，对美国唯唯是诺，事事唯山姆大叔马首是瞻，而是不该硬的时候不瞎硬，该硬的时候一定悄悄硬，时机、分寸都拿捏的恰到好处。像搞核武器这件事办的最漂亮。印度搞核武器起步晚，已经成了敏感话题，可人家照样搞成了，不管你什么"核俱乐部"、"核不扩散条约"，邻国有的我也要有，也不管你美国同意不同意，就这么着了，爱谁谁。最后布什也来拉拢阿三，居然说出"印度是美国在亚洲的天然盟友"这种话来，这么漂亮的事情日本人肯定干不出来。

我看也不一定搞就阿三没快感。只要煽情功夫到家，愤青浑身都是 G 点。在这个问题上，我非常赞同伟大领袖的说法，只有阳痿的领导，没有阳痿的群众。老帮菜大概都记得，文革的时候红卫兵不光是"火烧英国代办处"，莫为善小而不为，搞缅甸这样的国家也照样有快感。

缅甸 1948 年独立，1962 年军阀开始社会主义革命，驱逐华侨，1974 年改称"缅甸

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1967 年 6 月，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在缅甸的仰光，也在发生一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仰光大学就读的华人学生在胸前佩带红彤彤的毛泽东像章，并在学生中成立了“红卫兵”的组织，开始“革命的大辩论”。这种过激的行为方式当时在中国属于合法存在，但在异国的土地就完全是一种令缅甸当局无法忍受的行为。

冲突首先是在学生中开始。一派要誓死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导火线是关于毛泽东像章的佩带问题。“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们要捍卫“伟大统帅”的尊严；另一派主要由缅甸人组成的团体，就是不准佩带像章，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活。于是，双方由争执发展到斗殴，逐渐成为群体的撕打、械斗。发展到后来演变为缅甸政府幕后操纵的反华活动。几乎全缅甸的华人均被卷入这一灾难性的事件中。

按照当时的说法，奈温反动军人政府是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联合豢养的走狗。早在 1964 年，奈温政权实行“国有化运动”，仅在仰光一地就有 700 家华人企业被收归国有，致使许多华人、华侨在倾刻间家破人亡。文革开始后，反华排华的烈火，从首都仰光迅速蔓延到了第二大城市，华人稠密的聚居区瓦城。又从下缅甸迅速扩展至整个缅甸。许多华人财产被查收，被抄家，人被打死打伤。部分革命侨领与学生中的革命积极分子，通过秘密渠道回国。1967 年 6 月，数千名缅甸人对仰光华人居住区实施打、砸、抢，杀害华侨 40 余人。同时，这批受“指使”的暴徒又冲击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和新华社、中国民航办事处，并杀害了中国专家刘逸。缅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逮捕了 80 多名华侨。这是缅甸当代最为严重的一次反华排华事件，旅缅约 80 万华人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华人与缅族的矛盾也同时进一步加深。

当时国内的红卫兵也没闲着，开始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如果没有这档子事，我这一辈子大概也不会知道“德钦巴登顶”这个绕嘴的名字。凡是老帮菜大概都记得，此人是 60 年代末缅甸共产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在当时红卫兵运动的时候他老人家不甘寂寞，在北京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缅甸的蒋介石——奈温军人政府必败！人民必胜!》。张口闭口就是“同志们、战友们”，俨然一副造反派的口气。那时候一提起缅甸首相吴奈温，前边一定要加上一个“反动军人政府”， 德钦巴登顶为了和中国人套近乎，又把奈温和老蒋扯在了一起。

现在回想起来，好像红卫兵们都很爽，并没有因为缅甸是个弹丸小国而减少了快感。倒是缅甸政府有些架不住，以后奈温访问中国，一肚子不满向周恩来总理倾诉，说自己当时受到了缅甸红卫兵的攻击。总理“机智而幽默”地说，我也被攻击了，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例外。李先念副总理跟着说，总理的大字报，街上都有。听这口气就跟后来人们谈论西藏喇嘛挨斗的事情一样：十年动乱，汉人也是受害者。

愤愤不惹阿三的主要原因当然是政府不让惹，至少是不提倡惹。关于中印边界那档子事情以前还提一下，比如 86 年的人民日报，现在则唯恐避之不及，怕愤青们再哪壶不开提哪壶，失地事小，安定团结事大。尤其这件事涉及到伟大领袖的名誉，弄不好就暴露了真相，捅破了这层窗户纸，让人们认识到伟大领袖“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送地娘娘。如果我是胡锦涛的话，一定会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伟大领袖的声誉。甚至自己倒了都不要紧，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家族照样可以吃香的喝辣的，本人也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但老毛一倒，则共产党和官僚集团

永无翻身之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再有，印度除了巴基斯坦以外几乎没有敌人，无论东西方世界都一样，弄不好又像上次一样，被人认为是挑战"不结盟运动"。若跟印度作对可能会死得很难看，所有我们的手段人家都会，对付西方那套对付阿三恐怕不好使。而且印侨在黑非洲在非洲，特别是在南非、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型印侨企业团体遍布，虽然人家政府投资不如中国多，但皮肤颜色相近，沟通起来比我们容易多了。如果跟阿三别苗头，那些非洲小兄弟们可不会闲着，肯定会借机狠狠地敲我们一笔。

煽动民族主义，中国也有失手的时候。像当年老江处理美国炸馆事件，就属于玩了多年鹰最后被鹰啄了眼。现在回国头来看，当时不如或者就接受美国"误炸"的说法，趁机敲老美一笔；或者就索性硬到底，该打就打，弄个阶段性胜利再说；不开打，至少也撤回大使弄个临时代办糊弄几个月表示个姿态。老江倒好，义正词严地把大家都挑逗的火烧火燎的，他倒跑到美国访问去了。国人对你先去还是对方先来看得很重，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谁求谁的问题，谁服了谁的问题，所以认为这次是老江丢了中国人的脸面。当时我听某愤老教授在报告中公开耻笑老江："块头挺大，就是没有骨头，全是囊踹。"

其实现在的中国存在的很多现象，完全是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差别，甚至是人脑进化中的差别。就拿奥运会来说，无论古今，奥运都是摘金夺银，着重于彰显人类因坚定的信念而激发的潜能与荣获的成就，只不过古今的信念截然不同。洋古人和现代中国人一样，是舍命求荣，赢了就是国家英雄，输了就是民族败类，连回家都要"沿小巷过短桥僻静安全"，和当年朱建华没拿金牌的情况差不多。而现代奥运是战胜自我，挑战极限，一瘸一拐跑到在最后的肯尼亚黑人选手照样受人尊重。

还有现在自治区讨论的"总体思维（或曰捆绑式思维）"也是一样。倒退千百年，人们对自然界、生命的认识只能是总体思维。现在国人一是爱说谋略，二是爱谈兵法，三就是爱拿思维说事，"改进中国人思维"之类的书泛滥成灾。老芦在凯迪贴出的"捆绑"系列，我原来觉得内容深奥，恐怕没多少人有兴趣，没想到点击率四五千，而且争论激烈。国内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已形成共识，认为光有社会制度变革不行，还要改造国民的劣根性，光改造国民的劣根性也不行，还必须改变国人的思维方式。而且只要一提思维，就要举中医的整体观念，要恢复发扬优秀传统思维。

其实在远古时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要观测人体内部的奥妙几乎不可能，认识的直观性和模糊性是他们共有的特点，所以无论哪个国家，都是整体多于微观，推测多于实证，哲学思索多于客观观察。根据几种自然元素组成万物的哲学思辨贯穿整个中西医学史，他们认为世界的万物可最终归因于几种简单的物质，中国传统医学的根基是是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气血津液学说。古人认为气、血、津液，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也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气、血、津液，是人体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生理活动的产物，也是这些组织器官进行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

看看别的国家的情况吧。尽管古印度医学发展缓慢而曲折，但人们在长期实践中还

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完整理论。在《阿输吠陀》中就有关于健康与疾病的三体液学说。这三体液是气、胆及痰（即气、粘液、胆汁），又称三大。古印度人认为三者必须均衡才能保持人体的健康，一旦紊乱，人就会生病。西方埃拉希斯特拉图斯（Erasistratus，公元前 310-250）提出过"灵气学说"：主张血液从静脉到动脉的循环；提出空气被吸入肺，进入心脏而形成"灵气"（pneuma），以后"灵气"再分布到全身，维持生命活动。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公元前 459-355，被尊为"医学之父"）和罗马时期的盖仑（Galen of Pergamum 公元 131-201）提出过四体液（humor, 血液、黄胆汁、黑胆汁和黏液）学说，认为机体的状态决定于四种体液（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的有机配合。中医有六淫致病学说，六淫中的"六"指的是风、火、寒、暑、湿、燥等六种气候变化，"淫"指的是太过，所谓过犹不及，当六种气候太过时，则侵犯人体的外邪，损害人的健康。古罗马时期的盖仑四特质学说（special qualities，热、冷、干和湿），从本质上这些中外古老医学没有多大的区别。而且都认为阴阳或体液平衡和谐就构成健康，不平衡或偏胜则产生疾病，治疗就是纠正偏胜，恢复平衡。区别就是后来西方人开始搞解剖生理，中国人仍然乐此不疲。

至于国人津津乐道的"天人合一"、"调动人体的内在抗病能力、调整机体和外界环境的平衡"的理论和做法，国外照样也有过，盖仑和希波克拉底都提出过自然疗法，要求医生相信病人自身的抗病能力。希波克拉底说："只要给'大自然'一次机会，大多数疾病都能自愈"，医生的职责只是协助他们进行抗病奋斗。其中在脍炙人口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中还有这么一句："为了病人本人的利益，我将采取一切必要的诊断和治疗的措施，同时，我一定要避免两种不正当的倾向:即过度治疗或无作用的治疗。"现在国内不少医科大学学生入学的时候还要像入党一般，举起右手，攥着拳头假模假式地庄严宣誓，字正腔圆地念这一句。有什么用啊，现在开一张 CT 片子回扣是 50 元，药品回扣是 10%，现在国人的处事准则是"有便宜不沾王八蛋"，谁愿意当王八蛋？

再拿中医诊断的"望闻问切"来说，在没有现代仪器设备的条件下各国都这么干，只是中国人一直坚持了下来，所以花样多一些就是了。不信把一群医生患者都赶到一个荒岛上去，没有 CT、心电图机、B 超、核磁共振，不能化验血象，你看他们能怎么看病，一定是望闻问切。古代由于对人体知识的严重不足，所以当时的医生几乎没有什么好办法来对患者进行检查，特别内部脏器的检查（连正常解剖知识都不具体，检查根本无从谈起）。

甚至连最基本的体格检查办法也只有在１８世纪后才完备起来。叩诊法是维也纳医生奥恩布鲁革(Auenbruger , 1722-1809)发明的，当时主要运用于胸部，即利用叩击产生的回音来判断胸腔情况。奥恩布鲁革的父亲开了个啤酒店，经常的需要用叩击酒桶的办法来了解酒桶里还有多少酒，奥恩布鲁革在父亲叩击酒桶的启发下发明了叩击法，但起初他的方法没有得到推广运用，直到１９世纪拿破仑的军医 Corvisart 读了他的书，才将他的方法在军队里推广。

药物也不例外，远古时代各国的药物都是有草根啃草根，有树皮扒树皮，有树叶搂树叶，只是到了近代，人们才想到了用化学的办法从里面把有效的成分提取出来，到了现代，才知道搞清这些药物的化学结构去人工合成、改造，甚至根据构效关系，合成一些自然界没有的物质，这过程倒是"从自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进化过程。

最近国内有人基于爱国主义的原则，提出了职工体检要突出中国特色，用中医诊断。据说还有单位搞了试点，结果弄出一堆阴虚阳虚，还是不知道血糖是不是高，血脂是不是浓，胆囊和腰子里是不是有石头。结果试点单位发表了几篇论文，获了个什么奖，以后再也没了动静。

近 30 年中国的进步还是很明显的，拿中国愤青泄愤和二战时期日本的愤青治国做比较我认为是不合适的。麦克阿瑟当时曾感言"日本是个未成熟的社会"、"以现代文明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如果是 45 岁的绅士的话，日本人不过是 12 岁的少年。"而中国现在非常务实，如这次东海油气田日本就有评论家说谈判的结果是 WIN-WIN，日本赢得了面子，中国赢得了里子。中国现在执行的是以务实为主、愤青为辅治国的治国方式，或曰务实为里，愤怒为表，比起二战时期的日本来要年长了许多，要按麦克阿瑟的计算方法，大概是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吧。

阿三误民主, 还是民主误阿三

民国时期袁世凯死后杨度送了一副挽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这里面我看实际上说了一个"是老袁误共和还是共和误老袁"的问题。老袁一生"误共和"的事情有四件：戊戌政变告密，辛亥年间窃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还有就是背叛共和称帝。其中的前三件事情要不是以讹传讹，要不就是上纲上线。那 21 条不过是为了保住国家做出点局部牺牲，再说牺牲那点利益和老毛这 9 万多藏南领土相比连个零头都不够，也不至于把全国人民气成这个样子。

这里面没什么争论的，我看就是老袁称帝这档子事。老袁算是让自己的宝贝儿子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民意"给坑惨了，老袁死后，当初主张恢复帝制那些人没有谁再站出来为老袁说话，更不用说人力车夫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的成员了。当初这些骆驼祥子、小凤仙们可都不是这样，都是些宁可不拉客也要老袁当皇帝的主儿。连外国教授也不闲着，在英文报纸杂志上撰文论述称帝的重要性，给老袁的感觉是世界人民都在盼望着他老人家称帝。这和现在左派领袖甘阳等引用的美国教授赞毛时代计划经济性质差不多，给人的印象是全世界都在盼望着中国恢复毛时代的计划经济。

后来众人都指责老袁把一个好好的共和给彻底断送了，弄得别人动不动还要"再造共和"，造了半天仍然是个怪胎。其实仔细想一想，老袁恢复帝制不过一场闹剧，无非就是让自己名誉扫地、遗臭万年，而于中国历史进程及对千万黎民并没有多少负面的影响，即使是有也到了几乎可忽略不计的程度。老袁一生并没有给历史带来了什么样的不可饶恕的恶果，反而是给历史留下了实实在在的改良和演进。

"共和误老袁"我看一点不假。凭老袁当时的实力，如果放开胆子独裁，挺起腰板专政，不赶共和的时髦，不和那帮国会烂仔纠缠，修铁路、建工厂、废科举、办学校，什么事情都能干成，至少落得个"老袁真能做"，弄不好还会流芳千古，对付一首"胡

而还有"当国歌唱。与其搞那烂共和，不如就明白告诉国民，我们比秦始皇独裁一百倍，中华民国或曰老袁独裁。凭着那小站精兵，龙虎狗诸将，以及袁世凯那身举重若轻，收拾残局，将各种冲突化于无形的本事，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人们现在说起印度民主，也有两种说法。一是民主误阿三：由于阿三实行了西方民主，才落得今天这副摸样，印度象只配让中国龙嘲笑；还有一种说法是阿三误民主，就是因为阿三没有完全按照西方的民主模式治理国家，夹带了不少私货，包括一些社会主义的东西，浓郁的南亚地方色彩如望族政治，以及印度独立后长期一党独大、多党并存的体制（40 多年，后来改了），把民主糟蹋的不成样子，把自己耽误了不说，还给中国编了部反面教材，弄得现在中国也不敢搞民主。

我们大学每年都要请 2-3 个国家级的大腕来做国际形势报告，给报告人的报酬一般是每小时 5 千元，这还是看面子。学校领导胆小怕事，一般都请主流大腕。几次听报告都出现了这种情况，报告人只要是说明中国不能实行西方民主，就一定要举印度的例子：中国要实行民主么？印度的国情和中国最相似，看看印度现状吧。再往下说，无非是介绍一下印度经常发生的暗杀和绑架、N 成文盲（经常变，弄不清应该是几成）、大街小巷铺天盖地的贫民窟和乞丐、饱受蹂躏的童妓、为丈夫陪葬被活活烧死的新娘和至今还没有绝迹的种姓制度。言者愤怒，听者恐惧，其中有些女同志还做出恶心呕吐的反应来。甚至有位大腕学者还指着孟买机场旁黑压压连绵数十公里的贫民窟群图片说：那些叫嚷取消户籍制度的学者们应该去印度看看，中国的户籍制度取消后城市也是这样！

在我们眼里，民主把阿三弄成了一盘散沙，根本没有任何对付灾害的能力；民主让阿三毫无信仰，自私自利贪生怕死，打起仗来，从来都是望风而逃；民主更造成了印度的低效率，无法集中力量办大事。当年我们都快打到新德里了，议会还在为打还是不打（"to fight or not to fight, it's a question"）进行无休止地争论。这种情况今天也依然存在。到印度投资的中外企业家，最头疼的事情就是民主的低效率，本来应该是毫无争议的利国利民的好事，在印度却要讨论个没完没了，永远也不会出现中国的"连夜召开会议"、"一条龙办公"、"当场拍板"。要是再牵涉点个人利益（如征地、拆迁），项目基本上就算是黄了，这也就是论基础建设，印度和我们差了 20 年的主要原因。没有糟糕的民主，印度今天也会和中国一样富裕。

即使是那些"不自由毋宁死"的民主斗士（现在一天比一天少，濒临绝迹），提起阿三来也是频频摇头，和主流学者不同的是他们认为不是民主误阿三，而是阿三误民主，正是由于阿三没有完整准确地理解西方民主的精髓，名义上是搞民主，实际上是在羞羞答答地搞社会主义，甚至还会举出尼赫鲁"印度社会主义"的例子。根据尼赫鲁的社会主义思想，印度独立后在政治体制上则应建立西方议会民主政体，具体说就是将英国殖民主义时期确立的议会制度，全盘接受下来，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加以修订完善，所以在形式上与西方特别是与英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印度在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很多东西都是计划经济体制那一套。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印度则是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

他们即使说起印度实行民主的好处，无非就是说印度实现了全民公费医疗，甚至还有一位举出个例子，说印度的老少边地区女孩子因为出嫁的时候女方家里要陪嫁一

笔昂贵的嫁妆，所以女孩通常要辍学打工才能把自己嫁出去。政府为了保证妇女受教育，要连续 20 年向生女孩子的家庭支付补贴，总额达 5 万美元，这对物价便宜的印度老少边地区绝对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一时出现了唐代的"不愿生男愿生女"。为了后来我在电视里看到了这个介绍（内蒙古电视台，七月一日，晚 7：50《求子狂想曲》)，看来真是确有其事。让这些民主派们再多说点印度民主的优越性，恐怕就是"下边没有了"。

依我看，"阿三误民主"和"民主误阿三"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还应该说明一点，民主制度确实也给印度带来了很多好处。一是让阿三少犯错误，不管阿三怎么穷、怎么落后，像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这样全国性的巨大灾难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而且作为弱国，还在外交上干出了几个大手笔，甚至称得上是绝唱，像我在前面说的几个例子：吞并锡金、侵占藏南、分裂东西巴、接纳流亡政府；更重要的是，没有英国留下的民主制度，就根本不会有今天大一统的印度。我认为，如果不是现在的民主制度，印度迟早会发生前南斯拉夫一样的先流血屠杀，后解体独立。

其实除了人口众多外，印度的国情和我们并不相似，宗教、民族、种姓等各种社会矛盾远比中国或其它任何国家复杂。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华"，是一个历史事实。而印度却不然，在英国人没有入侵印度之前，印度一直是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即使是英国人统治时期，仍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的国家，有"英属印度"（2/3）和"土邦印度"（1/3）之分。印度人对历史的骄傲，更多的是在文化上，比如采用"我和爷爷比童年"的办法就可以看出，我们在文化上难有什么自豪感。就说佛祖释迦牟尼，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的王子，大约与我国孔子同时代。看看佛学里面蕴含的哲学思想，对于生老病死、幸福痛苦的认识，没有诸如"觉悟"、"境界"、"智慧"、"缘分"这些翻译过来的佛教词汇，我们恐怕连个文章都写不出来。再回过头来看看《论语》开篇的三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些毫无智力含量的大白话，就知道黑格尔为什么会嘲笑孔子。

但印度在历史上从来就是个任人宰割的国家，这点上要比中国差了很多。印度历史上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粗略地说，印度历史统一与分裂的时间之比大体是三比七。即使是统一期间，仍有诸多小王国未归在帝国的版图内，实际上不过是以宗主权加在原来的统治机构之上而已。印度在英国人撤走以后，能够作为一个真正的统一国家存在至今，不能不说是印度的现代民主制度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阿三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看到老杜搞金文竖排 PDF，羞得我无地自容，又看到特首说遇到高水平跟帖是我的幸运，又诚惶诚恐，下班后顾不得休息，赶紧写出一贴，这次就 Fatfatbear 网友在跟帖中提出的三个问题说一下我的看法，咱没有特首那日产万节的本事，属急就章，诸位凑合看。

Fatfatbear 网友说：有三个问题，盼老金能在后面的文章中尽量解说：
1， 印度是如何在政治上实行西方议会民主的同时，确保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的计

划经济的？苏联和中共都是靠打击私营经济，镇压资本家地主，没收资本家财产，土改，公社集体农庄等等血腥暴力手段来实现原始积累，使所有民间财产变成政府财产之后，再集中国家所有资源人力来搞计划经济或者命令经济的。印度既然是民主体制，不可能使这些手段的吧？ 那他们是如何搞的？

首先澄清两个概念：

1、尼赫鲁提出的是印度要搞"民主社会主义"，也就是北欧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

2、为了区别西方国家、日本的计划经济，我认为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再加个修饰词，指令性计划经济；而中国 1957 年以后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则应再加个修饰词，胡乱指令性计划经济；

3、"在政治上实行西方议会民主的同时，确保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我看到的有这样几个方法：

（1）调节税收：通过调节税收的办法，发展国家需要的企业，控制不想要的企业。如各国的新兴工业都是这么起来的，污染严重的工业，或是没什么前途的夕阳工业都是这么给赶跑的；

（2）分配自然资源：有些自然资源是属于国家支配的，如矿山、油田，国家可以行使权力。现在查韦斯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就是这么干的；

（3）政府采购：中国的联想电脑、中外合资的大众轿车也是这么起来的，政府部门规定：买电脑必须买联想，买轿车是部级干部买奥迪，部级以下桑塔纳。好像其他国家如韩国也有类似的规定；另外，像美国的军火工业，一部分政府指导下外卖，一部分是政府直接采购；

（4）建国有企业：政府直接投资办企业，即国营企业或国有民营企业。各国的交通、航天、通讯、邮电很多都是国家投资办的，好像日本的 JR 就是这个性质；

（5）政策改变：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就意味着对钢铁、水泥行业的扶持，允许私人持枪是对军火行业的扶持；允许转基因产品上市又会对农业产生影响；中法关系又决定了法国可以可着劲地向台湾出售武器而中国政府和愤青一定会装聋作哑。

2，前两年和老芦也讨论过，日本当初经济起飞的时候，也有很浓厚的政府强力主导规划，统筹指导的“计划”影子，怎么小日本就成功了，三哥们就不行呢？

我认为是两个原因：

1、种族、文化的问题。就好比同样是在美国混，黑人比福建打工仔的条件要好得多，为什么华人行，黑人就不行呢？本坛在这方面的帖子很多，不重复了。我的印象是这些民族要么就是懒，像印度、印尼这些民族就是这样；要么就是坐不住，典型的就是南美人。足球场上，迪斯科舞厅里，人家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可当血汗成衣厂工人，坐那儿踩 8 小时的缝纫机却打死也不干；

2、宗教问题。凡是这种宗教意识强烈的东方国家，经济腾飞都要受影响，无论是伊斯兰教、佛教还是印度教，无一例外。我认为原因是：

（1）与欧洲、日本信教不同，这些教民不过是追求个精神寄托，或者依靠教会办个红白喜事。而在南亚和中东的这些国家则是行动指南。连妇女出门穿什么，受不受教育都要受宗教的约束，国家发展完全是戴着锁链跳舞；

（2）因为这些东方宗教都接受业报轮回的思想，革命意志衰弱，总是在前生来世上

绕圈子，不在今生比贡献。盼望着有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大山背走。福建浙江人之所以这么玩命的干活，就是因为知道幸福不会从天降，小康生活等不来；
（3）只要有强烈的宗教意识就要有冲突甚至战争，这种冲突可以发生在不同宗教之间，也可以发生在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之间。像印度经常发生的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之间的教派冲突就非常典型。就宗教信仰而言，伊斯兰教信奉真主，不搞偶像崇拜，印度教信奉多神，偶像崇拜盛行；穆斯林把牛肉视为主要的肉食来源，而印度教徒则把牛视为神，对神牛顶礼膜拜。因此在伊斯兰教的宰牲节时经常发生教派冲突，甚至发生流血事件。甚至生活习俗的不同也是冲突的重要原因。我知道的几起内地回汉冲突，无一例外的都是汉人和回民打架吃了亏，弄块猪排骨挂人家门口，或者用文字语言侮辱人家。我小时候就听说过这样的歌谣：猪尾巴尖，蘸白糖，先让回民尝一尝。汉仔打不过回仔的时候就老远唱这歌谣，现在想起来，真是造孽。

印度的缔造者尼赫鲁就非常憎恨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他认为这是印度落后停滞、四分五裂、遭受外国殖民统治的罪魁祸首。尼赫鲁治理印度的重要思想之一，就是必须坚持世俗主义。这也被写入宪法之中，后来被证明是最终解决宗教纠纷的唯一选择。

3，中国和印度一样，离英国也是地域遥远，为什么英国似乎对中国始终没啥领土野心没想过建立大规模的殖民地之类的，但却在全印度就建立起来了殖民统治呢？按理说那时中国虽然是大一统，但国力衰弱的程度恐怕和印度差不多吧？英国这样全球扩张抢占建立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什么到了中国，只安心于香港这个弹丸之地，还要耐着性子和清政府打交道呢？最起码，以英国人的实力，在整个广东甚至福建等地建立殖民统治也是有可能的。

我认为有下面几个原因：
1、英国征服印度最初不是政府行为，而是东印度公司搞的，整个过程是个蚕食的过程。东印度公司（我们称为殖民机构）是个政商合一的团体，成立于 1600 年。公司成立之初，还是一个单纯的海外殖民贸易机构。后来逐渐拥有各种特权。在英国的支持下，东印度公司拥有军队和军舰，并有向印度宣战、占领印度土地、向印度居民征税、在印度颁布法律等权力。18 世纪后半期开始积极干预印度事务，一步步扩大势力。它在马德拉斯、加尔各答和孟买设立了商阜，从低买高卖，对印度进行疯狂的掠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它运来了军队，修筑了工事，对那些不听话的土邦王公实行武力征服。后来因为 1857 年爆发了大起义，英国只好取消了东印度公司，1858 年印度政府的统治权直接由英国政府承担，向印度派遣了第一任总督，1877 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成为印度女王，印度完全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让我们不能理解的是，印度民族大起义不是因为什么阶级压迫，而是宗教习俗的侮辱。起义爆发的导火线是关于子弹润滑油的传言。1857 年初在开始印度雇佣兵中流传这样一种说法：东印度公司用猪油或牛脂做润滑油涂在来福枪的子弹上。当时在装子弹之前，士兵必须用牙齿咬破来福枪子弹的弹壳，印度教徒敬牛，而伊斯兰教徒禁忌猪肉，所以使用这种新子弹有明显的种族、宗教歧视，严重伤害了广大信仰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士兵的感情。尽管后来东印度公司宣称，这种说法是谣言，并且已经换了新的用腊作润滑剂的子弹。但是印度士兵依然怀疑润滑油有问题，军队哗

变事件不断发生。以后发生了士兵、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联合起义。起义军把所有能找到的欧洲人和印度的基督教徒统统都杀光了。
这场起义在我们汉人看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甚至不可理解。华人在世界上能够和当地居民和平共处，至少只有人家轰咱们，没有咱们嫌人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宗教信仰，百无禁忌，就拿饮食习俗来说，除了死人不吃，没有什么不能吃的。按百姓的说法就是：长毛的不吃鸡毛掸子，长腿的不吃板凳；

2、印度当时的国力和大清根本无法相比，印度当时根本不是一个国家。后面我准备介绍一下印度的历史；
3、李鸿章的以夷制夷政策也多少发挥了些作用。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多吃多占其他国家就会眼红；
4、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半殖民地"政策是正确的，付出极小，收获巨大。如果真来管理中国这样的大国，很可能会把英国拖垮。

我们不能理解的信仰问题

要说阿三们在一起过日子能过到今天这份上也真不容易。有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习俗和宗教信仰的人群在一起生活相处，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像加拿大的英裔法裔彼此就看着不顺眼，加拿大政府好吃好喝的也没亏待魁北克什么，历史上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过节儿，可人家就是总想单过。我遇到过一个老魁，问过他类似的问题，也不知是我的英语不好还是怎么的，他说了半天也没说出个什么正经理由，好像魁独分子就是因为操法语说话，觉得不是一家人就不进一个门，就想闹独立当老大。是不是这样，老加应该最有发言权。

这印度的民族宗教问题复杂可是全世界公认的。印度领土面积 297.47 万平方公里，人口 10.27 亿，是个民族众多、文化各异的国家，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人种、宗教、语言博物馆"。印度现有 10 个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历史上，各民族教派之间有无数次大仇杀，光是那民族恨，就"比天高，比地厚，更比海洋深"。印度还是亚洲部族人口最多的国家，总人口在 3000 多万以上。据印度官方统计，印度共有 414 个部族，人口在 100 万以上的有 6 个。信奉印度教的占 82%，其余的信奉基督教、锡克教、佛教和耆那教等。印度的宗教、民族、种姓等各种社会矛盾远比中国或其它任何国家复杂。可人家阿三不但没分裂，还愣是拐了个佛教国家锡金进来，你说神奇不神奇。

现在我们之所以和其他五十几个民族关系处理比较好而和藏族同胞的关系有问题，就是因为藏族有自己的文化、语言和强烈的宗教信仰。而且因为高原缺氧，也没有办法让西藏的汉人成为主体，人海战术无法派上用场。所以，这次全球华人爱国大游行的标语"拖死达赖"、"同化藏人"，几乎是目前政府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选择，代表着中国政府的最高智慧。前者寄托着若干年后产生的新达赖不再和北京闹别扭的希望，后者则是想淡化藏人的宗教情结。

我们汉人可能确实不理解有宗教信仰的藏人的感情和他们的内心世界。前几天看电视，西藏自治区张书记在圣火传递到拉萨时又手举火炬发表讲话，大谈如何粉碎达赖的阴谋。看到这里我不禁又想到我前边说的"撕裂"。对这些有强烈宗教意识的藏

人来说，在这种场合如此谈论他们的宗教领袖，他们会是什么感受，即使是没有去过西藏的汉人也应该能体会到，何况是当地的党政首脑。六四的时候，湖南湘潭的两位毛老乡往天安门上悬挂的主席像泼墨汁，我的一个同事就非常气愤。他对我这样说："我也知道毛主席干了很多坏事，可毕竟是我们民族崇拜多年的偶像，现在看到有人这么糟蹋毛主席，我感情上接受不了。在世界面前，这让中国人的脸往哪儿放。"没有宗教情结的汉人还是这样，况且是藏人！

老邓对老毛采取抽象肯定，推向神坛，具体问题不争论，该干什么干什么的做法，除了对共产党继续执政有好处以外，还有个好处就是考虑到国人的感受。国人虽然没信仰，但毕竟有面子，有感情。周恩来为什么在国际舞台享有威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善解人意"，对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注意礼节，"外交无小事"，生怕伤了对方的感情。

说起信仰来，还要说一下所谓负帕累托。秦晖认为文革把中国的经济搞成了"负帕累托"的状态，也就是最差状态，也可以简单理解为"一张白纸没有负担"，所以后来中国经济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怎么折腾怎么有，所以取得了今天的经济奇迹。老芦认为老毛把国人的思维能力也搞成了"一张白纸没有负担"，结果成了"人脑是颗红玛瑙，党爱怎雕便怎雕"，所以政府根据需要批量生产了众多愤青。依我看，老毛把国人的信仰也给彻底破坏了，从字典中彻底抹掉了"信仰"二字，弄得全民族都是"有奶便认娘"，"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好死不如赖活着"。

大多数汉人从来就没什么理想和信仰，更不肯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而献身或牺牲什么。在现实生活中我遇到过不少信佛的人，无非是有钱的出钱（现在有的寺庙一炷香已经到了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元，专敲大款），没钱的出力（经常烧香磕头），无论怎么虔诚，目的都差不多，无非是功利目的，保佑自己升官发迹，生意兴隆，炒股只赚不赔，或者抱个大胖小子。在中国发生的大小冲突也大都是为了利益，如甲村占了乙村的地，乙村用了甲村的水，再不就是小孩打架一方吃了亏。而那些宗教色彩浓郁的国家，却是因为虚无缥缈的信仰发生冲突。这些国家的宗教精神和宗教习俗存在于每一个角落，包括贫苦的农村。他们常常为了信仰的不同打得死去活来。像印度的穆斯林地区，就经常是因为印度教徒在这一地区修建了印度庙的寺庙而造反，或者是违反了自己的宗教习俗而闹事。

对国人来说，利益的力量是无穷的。共产党的军队所以能够取胜，除了仇恨的力量外（如两忆三查），重要的是那句妇孺皆知的口号：打倒地主分田地（早期是"打土豪分田地"），就是跟着共产党走可以分上三亩地一头牛，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而不是靠什么空洞的信仰和理想，这就彻底解决了"奶"的问题，也就是"为谁扛枪，为谁打仗"。老蒋始终没能提出什么振奋人心的口号，"不解决奶的问题，认娘只是一句空话"，带着一群找不到奶的孩子，不打败仗才怪。老蒋只是到了台湾，才想起了搞土改，给农民分了土地。可惜是"孩子死了，奶来了。"当然，这是句玩笑话，放着四个野战军给你捣乱，像搞土改这种事情连想都别想。

后来老邓的改革开放也是一样，不是靠什么理论，一句"先富起来"口号，再靠着老毛留下的负帕累托状态，把责任田一分，立马粮票、布票、糖票、棉花票统统扔到太平洋里去了，虽然人们还"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但只要得到了实惠，就

不会有什么大乱子。现在中央始终不愿意把发展速度降下来，就是因为不管有什么社会问题，只要大多数人能继续得到实惠，就不会出大事。包括被海外侨胞诟病的中国城市建设，其实不管城市的水泥森林多丑陋，只要居住面积增加了，老百姓就高兴，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但在毛泽东时代以前，历朝历代，少数知识分子士大夫还是有信仰、有理想的、有气节的， 知识分子标榜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饿死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一直到中共早期的革命家，包括毛泽东本人都是这样的一些有理想和信仰的志士。哪怕是最烂的明朝，也有些南明士大夫和今天的毛左一样，视满清为异族，而视南明为儒家纲常伦理的正朔。但和毛左不同的是，人家以气节相标榜，举兵反抗，像顾炎武、黄宗羲等志节之士。更多不肯降清的士大夫看到没什么复明的希望后就隐居在深山，或者是出家，因为在封建社会，和尚，道士，倡优可以不降，可以不按满清的方式剃头，这是虽然是无奈之举，但也算保持了气节操守。

现代中国人的信仰缺失，首先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可供信仰的东西。无论哪一种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至少从教义上看都不错，都可以拿出点合理的东西来。像基督教的博爱，佛教的业报轮回，甚至像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只要不发动战争，无论再怎么邪恶，总是有它可以让人信服的一面。

唯独这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战争年代倒是还可以当"精神原子弹"用一用，但在和平年代根本无法让人去信仰。对毛泽东思想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根本不是现在说的什么"两个务必"、"为人民服务"，而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就是在和平年代要"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无论是多么坚定的毛左，谁也无法否认这一点。记得文革的一句马屁话就是"这个问题马克思没有预见到，列宁死的太早，斯大林没有解决好"。

阶级斗争理论这玩意倒不是邪恶不邪恶的问题，而是荒谬，更重要的是在和平年代根本没办法操作。这"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实很简单，就是没事大家坐一块按照领袖说的先分个敌我友，找出阶级敌人，然后死掐（原话是"全民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掐死一帮后再分个敌我友，然后再死掐。头几个回合没什么障碍，而且一定会感觉很爽，问题是越掐敌人越多，越掐敌我友越不好分，越掐领袖自己也越糊涂，所以掐上几个回合就玩不下去了，最后只好终止游戏。尤其到了第二代领袖以后，连个分敌我友的资格都没有了，弄不好挨掐的就是自己。

所以，各种主义、思想，不知哪一天都可能回潮，在中国大地再度泛滥，唯独这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可能永远要跟老人家一起躺在水晶棺材里了。

中国人没有信仰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几次政治运动下来，把但凡有点信仰，有点骨气的人都给收拾了，我这里主要还不是指肉体，而是把人们的精神世界打扫的干干净净。人人都成了"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这也是为什么王朔的痞子小说一炮走红的原因，毕竟真痞子比伪君子教人看着顺眼，这不是我的发现，老芦这方面有专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信仰，也是我们经济腾飞的重要原因。正是因为我们没有信仰，只是一门心思想致富，而且这种欲望"是任何力量都挡不住的，完全挡不住的"。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只要政府想引进的、能引进的，只要不危害政权生存的，都可以敞着怀的引进，不需要有任何顾虑。西方的东西进入中国，都没有遇到什么实质性的抵抗。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画任何怪诞的图画，写任何自创的文字。

我现在特别关注中国的毛左们，看看他们里面有没有像几个南明的士大夫，清朝的遗老遗少那样，坚持毛泽东思想（此处指核心），为伟大领袖尽孤忠的。如果有的话，哪怕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也会对他们充满敬意。但结果非常让我失望。没有一个为了能够为毛泽东思想而牺牲眼前哪怕丁点利益的。都是一面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狂奔，享受着引进资本主义后带来的好处，一面嘴上喊着坚持毛泽东思想，反对改革开放。找遍全世界，也找不到一个肯为毛老人家牺牲点什么的毛左圣徒。

当年伯夷、叔齐在武王和姜子牙军前叩马而谏，反对武王伐纣，失败之后，"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在伯夷、叔齐眼中，周王朝是不孝不仁得来的天下，因此他们以周王朝为耻，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靠采薇维生。采薇而食的日子并不好过，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采薇》这篇小说中甚至给伯夷、叔齐列了一个薇菜的食谱：薇汤，薇羹，薇酱，清燉薇，原汤焖薇芽，生晒嫩薇叶……，老鲁的刻薄，真是到了骨子里！蜀汉谯周在《古史考》中还记载了一个伯夷、叔齐饿死的传说：野有妇人谓之曰："子义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这位妇人虽然没什么文化，却长着老芦一样的毒眼，为伯夷、叔齐挑了一个概念上的错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薇也是周朝的草木，你们不食周粟，却食周的草木，只是味道差了些，性质有何不同？面对这个尖锐的指控，伯夷、叔齐没有王顾左右而言他，而是深刻反省自己，不能两全之下，只好饿死了事。

再看看那些黎阳、李宪源、史玉柱、王任重、魏巍、贺敬之这些毛左大家们，要么就是在他们诅咒、憎恶、要推翻的体制内的担任高官（如党和国家领导人王任重等），要么就是老毛最憎恨的剥削阶级要员（如大资本家史玉柱等），要么就是在老人家要砸烂的万恶资本主义社会讨生活的混混儿（如美国加拿大的黎阳、李宪源等），而且儿子死了还有孙子，还想世世代代在花花世界混下去。甚至像杨帆这样的毛左经济学家，自己在国外混不出个名堂，要学问没人听，说外语没人懂（我听过他的报告，偶尔插个外语单词进来，跟鸭子叫唤差不多），但也是把子女送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实在教人鄙视。

再回过头看看那些终老南山、死也不肯在清朝当官的南明士大夫，满清推翻后受尽耻笑，拖着长辫子艰辛讨生活的遗老遗少，真是令人肃然起敬。说实话，我并不赞成达赖喇嘛关于"大藏区"高度自治的主张，我认为那行不通，问题太多。但看到一个七十几岁的老人，为了保存自己民族的宗教和文化（尽管在我们看来是反动和落后的），在 13 亿人民的谴责和咒骂声中，几十年如一日在世界各地蹒跚行走，孤独地传教布道，我仿佛感到了一种"场"的存在（不知气场还是磁场），有一种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与之相比，那种被国人认为让全世界发抖的红海洋，真是算不了什么。

与达赖相似的是，印度的甘地除了主张印度统一独立外，其他观点也都是落后和反动的。而且和达赖还不一样，达赖的观点主张是正确还是错误尚有争论，而甘地那一套没什么疑问，确确实实反动落后到了极点。甘地将现代文明所制造的一切物质财富视为罪恶，对现代文明持连根拔除的态度，否定现代城市生活，否定现代工业制度，反对工业化和大机器，主张回到传统的小农社会，恢复自给自足的村社自治。实实在在是现代社会的绊脚石，螳臂当车可笑不自量。尽管如此，除了在中国甘地受到耻笑外，世界大部分地方，无论对于敌人还是他的追随者，甘地永远是受尊敬的圣徒。人们从中还看到了它的永恒的美学价值，但这种美学价值可能不会被国人欣赏，大多数人眼里，只有兰博、格瓦拉、斯大林、毛泽东甚至希特勒才是英雄，那个半裸的黑和尚甘地永远只配让人可怜。

阿三选择民主是历史的必然?

回答胖胖熊的问题折腾到半夜，躺下后睡意全无，"夜不能寐，欣然命笔"，索性接着再写点阿三的事情。网友们对"中国印度国情相似"印象颇深，认为都是东方文明古国，看来还得多说两句印度历史。

尽管印度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但按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印度人没有历史"。人们现在分析马克思这句话的含义可能是指印度历史具有这样两个特点：

第一，印度古代缺乏有正式文字记载的可信的历史，印度人不重视记录历史，有的只是神话故事和宗教经典。中国古代以帝王的年号纪年，历史纪年虽然也不统一，但中国各朝代都十分注重历史记载，设有坊门的史官，记录下皇帝的一举一动，因此每个朝代的历史都能大概搞清楚。印度则不然，只重宗教，不重历史，宫廷有为皇帝举行祭祀的专家，却没有史官。所以，印度的历史可以说是一本糊涂帐。幸存的极少的史书也都不靠谱，印度的史官们也和老枭一般半人半仙，有些史书干脆就是以诗歌的形式写成的，弥漫着诗意和感情的气氛，里面的人物也是随意美化任意拔高，稍微有点作为的就成了神，动辄就是"比佛祖更伟大"。

印度的神话和其它国家也还不太一样，像希腊神话完全是神话，那些快活的 playboy 们（加人语）很难和现实国王、王子和大臣们联系在一起，如有巧合，纯属偶然。而欧洲真正的史料却都很严肃，哪怕小到一个社区的人口记载，都非常详细可信。而印度这个东方民族和中国也有相似的地方，用神话代替历史。史书写得真真假假、神神道道，说它是历史，里面净是些不着边际的玩意，几乎每一页都掺杂着大量的空想和传说；说它是神话，人家又确实在写事件和人物，所以使人无法判断究竟是真实的历史还是神话故事。

印度的历史记载没有统一的纪年，不同时代、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纪年。印度使用纪年多达 20 种以上。搞不清楚每个纪年的准确年代，以及各纪年的前后联系。印度历史上的一些事件和人物，是靠外国人的记录才能了解的。研究印度历史必须借助古代希腊、罗马、中国和穆斯林国家的文献，近代印度历史则要依靠英语文献。这和现在中国的情况差不多，像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六四这些事，至今还离不开"充满傲慢与偏见"的英语文献。连 70 年代的板桥水库垮坝事件，人们也是看

英文材料才知道的。

中国又是一个路数，就是用小说代替历史，虽然比印度神话可信些，但在辨伪时却增加了不少难度，也平添了不少乐趣。"用写小说代替写历史"这可不是我说的，是共党领袖陈独秀在《红楼梦》序言《红楼梦新叙》中的观点。他说，中国小说"出于稗官"，西洋小说"起于神话"，都是"善述故事"。到了近代，西洋小说"受了实证科学的方法之影响"，变为"专重善写人情"，"善述故事一方面遂完全划归历史范围"。而中国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捆绑式写作，小说历史一勺烩，人们弄不清是小说还是历史。

陈独秀得出上述的结论，是源于对中外小说的比较分析和对本土小说问题的发现。他指出本土小说，包括《红楼梦》之所以有许多琐屑，是小说家和历史家没有分工的缘故。这种不分工的结果，造成了文学和历史的两败俱伤。陈独秀提出"今后我们应该觉悟，我们领略《石头记》应该领略他善写人情，不应该领略他的善述故事：今后我们更应该觉悟，我们做小说的人，只应该做善写人情的小说，不应该做善述故事的小说。"他啰嗦了半天就是花开文学历史两朵，史家和小说家各表一枝。

类似的观点老芦在和别的网友辩论中提到过，并写过评论司马迁《史记》的文章，意思说《史记》是文学作品而不是可靠的史书。鲁迅说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半句不错，前半句却不敢苟同。

第二，印度历史上屡遭外族入侵，它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不断为外族征服的历史，按我们的说法就是屈辱史、血泪史。而且印度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类似于中国的"五胡十六国"。在印度这片土地上只是存在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政治实体，它们之间长期争战不已，相互吞并，根本不存在印度这么个国家。

印度历史上只有三个的统一的王朝：孔雀王朝、笈多王朝和莫卧尔王朝。这三个帝国也不过是统治了超过次大陆半数的土地，其他王朝都只能称其为地方性政权。即使是这三个大的王朝，也从来没有完全统一过次大陆，仍有诸多小王国未归在帝国的版图内，实际上也只不过是以宗主权加在原来的统治机构之上而已。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分裂的历史传统，使印度很难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在英国人没有到来以前，次大陆上只有许多小的王国。因此，统一的"民族"、"国家"之类的概念，在印度出现比在中国出现晚得多。

古代印度人使用"婆罗多的土地"来称呼他们居住的土地。"Bharat"是印度神中的一位雅利安国王，因此，这个词的含义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今日印度宪法使用两个词来定义其国家，一个是"India 印度"，一个是"Bharat"，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印度历史上的一些王国或地区的名字，通常是用当地居住民族的名称的复数形式命名，而不是以自然景观命名。如古代的阿利迦、羯陵伽、潘查拉等，都是民族的名字。这种情况今日依然。今日印度的许多地名，如古吉拉特、泰米尔纳德、喀拉拉、孟加拉、那迦兰等，实际上都代表着一个占多数的民族群体、一种语言、一种宗教信仰。这也是印度人缺乏超越宗教、超越地域和种族的国家、民族意识的一个例子。

"印度"（India 印度）一词来自古语"Sindhu"（中国古代译作"身毒"），意即河流，尤指印度河，没有"国家"的意思。波斯人、希腊人以及罗马人称印度河流域的土地为"Hind"或"India（印度）"，但印度人直到穆斯林到来后才使用这个词。穆斯林称他们征服的次大陆土地为"印度斯坦"。过去的印度和今天我们称呼"海湾地区"、"加勒比海地区"、"中东地区"的意思差不多，按我们北方人的话说，所谓印度人，就是居住生活在印度河流域"那一疙瘩"、"那一划拉"、"那一片"的人。

是英国殖民者让印度人第一次有了"统一印度"、"印度民族"这样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英国佬就没有大印度。有意思的是，后来甘地领导的民族主义以及民族解放运动，都是以英国人的征服所带来的统一印度为前提的。这使我想起谈论中国清王朝的建立民间有这么一段歌谣："朱家的面，李家的磨，磨成了一个大馍馍，送给隔壁的赵大哥。"这里的"朱家的面，李家的磨"，是指江山是朱元璋挣下的，叫李自成给推翻了，最后隔壁的辫子兵捡了个洋落儿（北方话，捡了个便宜的意思）。这印度完全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亲手缔造的，维多利亚女王亲自指挥的，"公司的面，女王的磨，磨成了一个大馍馍，送给了圣雄甘地哥。"凭印度本土人，无论如何干不成这件事。

可能诸位认为我说这话有点绝对，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关键是我们汉人对种族宗教的认识有误。

在印度，解决民族宗教问题之难，难于上青天。因为阿三的多民族和咱们的 56 个民族 56 朵花完全不是一回事，印度花虽然可能不如咱们多，可朵朵都是带刺的玫瑰，那些部落也远不像傣村苗寨那么好对付。咱们的民族概念实际上不过是居住地和生活习惯不同的人群，除了藏族和维族外，大多没有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的问题。有些虽然也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但和汉族差距太大，最终还得学习使用汉语。像我曾经接触过的一个少数民族，它们的数字只能数到一千，原因很简单，就是整个村子就是几十户人，几十只羊，一般一百也就够了。捆绑式计算，最多也就是一千。他们的语言也就是些生活用语，因为和外界没有联系，人们彼此之间的交流也很简单，来回来去就是村里那点破事。因为生产力落后，大部分时间是干活，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抽闷烟，或者围着火堆蹦来蹦去。所谓风俗习惯，也就是办红白喜事和我们有些差别。

中国很多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差别一点不比不同地区的汉人差别大。比如说广西的壮族，所谓民族风俗，不过是织壮锦，而我们汉人是绣金匾、刺苏绣，差别不大，最后统统是献给毛主席。抛绣球砸女婿也是很多地方都有的习俗。在内地，就是民族个性明显的回族，由于多以小聚居的方式散居在中国各地，不过是因为固守着不吃猪肉的饮食习惯（有清真饮食习惯的民族除了回族以外，还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柯尔克孜族、撒拉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保安族等），才让人感觉到他们是少数民族。我同学、同事中有不少回族，问起可兰经之类的问题来，一个个把头摇得跟不楞鼓一样，清真饭店招牌上那几个字母也都不认识，如果不是看电影，"主是安拉，穆罕默德是他的忠实使徒"也没听说过。这些回回甚至连为什么穆斯林不吃猪肉都说不清楚，最多也就是说猪不洁、污秽。正因为回回自己都说不清楚，所以才有了汉族小子那种侮辱性的说法：猪是回回的祖先（即所谓

猪爷爷、狗奶奶、驴大伯），回民不吃猪肉实际上就是不吃自己的祖先。即便如此，对于回回来说，坚定的保持本民族的饮食习俗还有着反对民族歧视、抵制民族同化的意义。

扯远了，还接着说阿三民主的事。英国佬管理印度比我们管理西藏难度要大得多，我们面临的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汉人和有宗教信仰的藏人怎样相处的问题，而英国面临着是一群不同宗教信仰的族群放在一起如何管理的问题。而且在南亚次大陆，对宗教经典的理解不仅仅限于少数的哲学家和学者，宗教习俗和宗教精神在次大陆的广大乡村也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和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民族认同。而实际上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和睦相处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像前面提到的，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之间的问题就很棘手：印度教徒则把牛视为神，对神牛顶礼膜拜。印度教是泛神教，不光是牛，许多生物包括老鼠都是神，都是敬重的对象。而穆斯林就好牛肉这一口，专宰印度教徒心中的神。你闷头吃牛肉也就算了，可偏偏穆斯林还有个重大节日——宰牲节，因为《可兰经》里面明确说明了"血、猪肉、自死的、以及未以真主之名宰牲的，不可食。"、"他（此处指真主）只是对你们禁忌自死的、 血、猪肉、与宰割时不以安拉的名高呼的。"

英国人在印度处理民族宗教问题采取的办法很成功，要是碰上小布什，恐怕连个旁遮普邦都搞不定，更不用说这么个大印度了（当然时代不同了，过去那一套现在不能用了）。19 世纪初英国将法国等势力逐出印度，以后经过三次迈索尔战争、三次与马拉塔人的战争、两次与锡克人的战争，共打了大小一百多次仗，把印度人打得口服心服，最后终于在印度确立了自己的统治。英国人建立统治后，采取了逐渐削弱种姓和地方集团的力量、强化政府作用的政策。英国佬也知道靠着他们这几个人、这几杆枪不行，没有一个阿三的军队，就没有阿三的一切，所以首先组建了西方式现代军队。

这支西方式现代军队与古代征服者土耳其人和莫卧尔人的军队不同，它不是由单一种族、单一宗教信仰的人组成，军队中既有锡克人，也有泰米尔人。这实际上是在印度第一次建立了超越种族、种姓集团和宗教信仰的社会组织，也就是"军队国家化"，军队不再是种族和宗教的武装力量，人民军队只忠于国家。现代化军队的建立增强了英属印度政府控制社会的能力。它首先是用来维持国内秩序，打击犯罪部落，其次对那些尚未在英国人直接统治之下的各个土邦起着很大的震慑作用，因而地方割据力量受到空前未有的强有力的抑制。英国还在印度建立起近代资产阶级文官制度，独立后，留在印度的文官被印度政府全部接受下来。

有了军队后，英国佬又建立了民主议会制度，让各民族、社会各阶层都有发泄的渠道。然后用民主的方法定下一些规矩，你过你的宰牲节，你敬你的神牛，谁也别出圈，由英国人当裁判，不听话军队警察的大棒伺候。在英国统治印度期间虽然也有不少麻烦，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成功，把一个个不同宗教、种族、文化和生活习俗的土邦，愣是捏成了一个现代国家。这种建国和我们的建国根本不是一个概念。打个比喻，原来不过是一片片散落的木板，靠着粘合剂粘在一起，再加一道铁箍制成了一个水桶，这粘合剂就是英国的民主政治制度，那铁箍就是英国军队和英国人组建的印度军队。

阿三能够维持到今天，靠着是从英国那里继承的一套弹性较大的西方式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从整体上看符合印度社会复合、多元和分散的性质。首先，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体现的"权力分散"原则，适应了印度历史上长期地方分权、中央对地方控制能力相对弱小的特点。西方政治制度体现的"权力分享"、"权力平衡"原则，多元价值观、言论信仰自由原则，也符合印度社会宗教信仰多样性的特点。这种西式民主可以兼顾各阶层、各教派、各种姓集团的利益，为他们提供了发泄不满的渠道或安全阀，从而维系着印度各种力量的平衡，达到了凝聚作用。恐怕现在印度的马克思主义信徒是世界最多的国家，有些还在政府里担任要职。

独立后，印度语言、教派、种姓、民族等各种分裂因素一直是对其统一的挑战，但印度一直没有分裂，还拐进个倒插门女婿锡金，很大原因在于有了这种政治体制为印度提供了一种"胶合板"式的凝聚，国家、民族的统一系于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制衡，从而保证了整个国家的统一。说来也怪，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有不少一天到晚嚷嚷着分裂独立，可二战后，还从没有哪个这样的国家出现过分裂独立。社会主义国家一天到晚就强调"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横看竖看都是铁板一块，可最近 50 年内已经分裂和正在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全都是社会主义或其他专制国家。

今天的印度是一个由印度斯坦、泰卢固、孟加拉、泰米尔等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其中主体印度斯坦族也不过占全国人口的 46.3％，连一半都不到，其它为泰鲁固族、孟加拉族、马拉提族、泰米尔族、古吉拉特族、卡纳达族、马拉雅拉姆族、奥里雅族、旁遮普族、锡克族等。玩"大印度斯坦族"主义肯定是不灵，用移民的方法也解决不了问题。宗教信仰也很复杂，约 82％的居民信奉印度教，其余的分别信奉伊斯兰教、基督教、锡克教、佛教和耆那教等。印度的语言也异常繁杂，宪法承认的语言有 10 多种，登记注册的达 1600 多种，英语和印地语同为印度的官方语言。

英国佬把英语定为印度的官方语言，和当年日本人在伪满洲国推行的奴化教育学日语还不太一样，因为印度各族人民根本没有可以交流的共同语言。殖民政府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使南印度操泰米尔语的婆罗门与北印度操印地语的婆罗门第一次有了交流思想的可能。另外，与古代异民族的入侵不同，英国是同先进的工业技术一起进入印度的。东印度公司为掠夺印度而修建的铁路、公路以及邮电通讯等设施第一次把次大陆各个孤立闭塞的地区联系起来了，使印度出现了跨地区、跨宗教的凝聚力量，把印度真正成为一个国家。国家正是人们调和阶级矛盾、种族矛盾、宗教矛盾以及其它矛盾的适当场合，而宪法正是调解人们之间矛盾的最后的手段。

英国人作为第三者，有些问题可以很超脱，而且有强大的武力做后盾，发生了什么民族冲突，一句"阿三，老鹰来了"，就可以搞定。但如果印度人自己治理国家，这些优势将不复存在，而且强势民族总是想欺负弱势民族，即使能做到一碗水端平，弱势民族总还会觉得自己受到了欺负，时刻有民族要独立，要当家作主的冲动。所以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印度独立也意味着点燃暴力冲突的火药库。之所以到现在这个火药库还没有被引爆，不能不提在印度实现独立和民主宪政的历程中的两个政治领袖：甘地和尼赫鲁。是这两个人开拓了独具特色、符合印度国情的印度道路。没有甘地，印度很难逃脱二十世纪的激进主义洪流，早晚会发生大规模的暴力冲突；而没有尼赫鲁，印度也不会按部就班地迈入民主宪政的轨道。甘地是印度全国的精

神领袖，而尼赫鲁为印度提供了可操作的发展模式。

先说几句甘地。我认为最重要的还不是甘地为印度独立做出了什么了不起的贡献，有没有甘地，英国的殖民主义者都要撤出印度，只是个早晚的问题。我认为甘地的最大贡献是给印度甚至世界做了个示范，有什么事和平解决，再不行折腾自己的肚子（绝食），千万别杀人放火。这次你占了便宜，下次倒血霉可能就是你。甘地最后的胜利正是非暴力运动所力图达到的效果：通过展示自己的苦难，揭示不公，焕发对方的良知，从而变革社会。甘地的做法虽然效果出来的慢了点，但作用持久，今天还有意义。尽管甘地在具体做法上有很多毛病，他本人是个虔诚的教徒，所以常常将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扯在一起，动辄直接运用绝食、祈祷等宗教方法解决政治问题，并且经常引用宗教词汇，一再提起上帝、罗摩等，强调运动在宗教方面的意义，从而使印度的民族民主运动带有强烈的宗教复兴主义的色彩。但毕竟他的手段还是非暴力，这种非暴力思想将会永远影响印度社会。

瘦弱的甘地不知道哪来的能量，经常一个人遏制所有政党及整个国家的暴力或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几次出现动乱苗头，人家都是一个人拿下。而且只要看谁有暴力倾向，倔老头一撂挑子就能拿下。对待英国殖民者就不用说了，对待党内的激进分子也是一样。30 年代末有个叫鲍斯的左倾分子当选为国大党主席，此人一向坚决主张反帝斗争和激进改革，后来的发展也表明其思想中存在强烈的暴力争取独立的倾向。甘地二话不说，带着所有的人退出了国大党，弄得国大党就剩下了鲍斯和他弟弟，所以只好辞职了事。后来鲍斯也要玩〝以夷制夷〞，寻求同德日法西斯合作以争取印度摆脱英国统治，也因甘地抵制遭到失败。

印度的宗教仇恨由来已久。印度教是印度次大陆本土形成的宗教，而伊斯兰教是随着穆斯林进人印度的。一些激进的印度教徒认为，伊斯兰教是入侵者的宗教，它在次大陆的繁衍，是印度教的耻辱。所以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曾发生几次大规模的教派冲突。甘地本人是个虔诚的印度教徒，可贵的是他超越了民族宗教，他告诫印度各派教徒说：最大的错误观点，莫过于认为印度只属于印度教徒，或认为巴基斯坦只属于穆斯林。虽然要改变全印度和巴基斯坦人民的意识是件艰苦的事，但只要我们齐心合力，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办成的。这才能使全印度都能从根本上消除不安定因素。他用各种方式，包括用自己的生命相要挟（尼赫鲁当时有句话：圣雄甘地的生命就是印度的灵魂），清除所有印度的纷争，让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兄弟般和睦相处。

可以想象，在印度这样一个宗教、种姓、种族、部族、语言都异常复杂的国家，如果没有甘地及其非暴力主义的控制，不知道会出现多少乱世英雄起四方，有多少平民百姓为了信仰、利益在内战、暴乱之中丧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整个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崇尚武力的时代，是需要英雄或屠夫而且英雄或屠夫辈出的时代。在这个血与火的百年中，民族独立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战纳粹日寇的屠杀都是亘古未有的，不管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结果都是大规模的流血死人。印度能摆脱激进主义、理想主义的洪流而不致陷入大规模的暴力冲突或者内战，总账算下来整个 20 世纪就没死几个人（恐怕连中国的零头都到不了，当然我们一定会找出各式各样的理由），不能不说有甘地的功劳。

印度光有甘地不行，他那些东西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很有限，甘地能够取得胜利主要是因为英国佬不敢滥用暴力，国内那些穆斯林、锡克族可不管这一套。例如旁遮普邦是锡克族的故乡，经济落后，再加上印度斯坦族与锡克族之间的宿仇，使旁遮普成为印度最不安定地区，有印度"火药桶"之称，真的把火药桶点爆后谁绝食也没用。印度建国后，尼赫鲁制定了一部议会民主政体的宪法、建立了自由选举制度、实行多党并存的政党制度、西方文官制度以及政府、邦院(上院)和人民院(下院)三权分立制度。印度人口众多、经济落后、文化水准低下，加之复杂的宗教、种族和种姓矛盾，堪称世界上国情最为复杂的国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独立五十余年来选举按时举行、议会民主从未中断，即便英•甘地采取紧急状态法有专断之嫌，但也始终未脱离宪法轨道，这不能不说是个世界奇迹。巴基斯坦比印度的国情简单的多，自己国家分裂赔出去一个东巴不说，可至今还是文官武将们换来换去，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地瞎折腾。

尼赫鲁的东西都很实用，印度宪法就是一部无所不包的、世界上最长的宪法，为印度各民族、各宗教信仰、各地方力量提供了一个富有弹性的基本框架。还有像印度民主制度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四十年的时间一直是一党独大多党并存的局面（1948-1988），但印度宪法和法律并不限制其它政党的存在。以后时机成熟后，再过渡到理想的两党制模式。这为印度独立以后长期保持政治稳定提供了条件。否则会像几乎所有的亚非拉国家一样，只要两党选票相差差不多，落选的一方一定会指责对手选举舞弊（而且几乎肯定是事实)，不承认选举结果，全国爆发骚乱，然后由一个武夫军棍出来收拾局面。巴基斯坦就是这么干的，民主的结果就是国家分裂，把个东巴变成了孟加拉国。

依我看处理民族宗教问题有下面几种方法：
一是在民主与法治的框架下，你拜你的，我磕我的。互相理解，互相包容；英国留下的方法就是这样；
二是你也别拜，我也别磕，这些统统都是封建迷信，要把封建主义思想转移到无产阶级革命轨道上来，咱们都是革命战友、阶级兄弟，一起拜领袖去，那才是人间正道；一般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这样干的；
三是谁的人数多、势力大、拳头硬谁就是老大，一切以老大为中心。弱势民族服从强势民族，弱势宗教服从强势宗教，不服者铁拳伺候。现代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各国好像都是这个状态。

第二、三种方法见效快，效果好，操作简单而不需要任何磨合。短期内也是民族空前团结，国家空前强大。只是时间都长不了，早晚要出事。中国在历史关头的种种选择，充分体现了中国人什么事情都要求"立竿见影"的思维方式。像现在我们搞科研也是一样，从上到下的要求都是搞点"短平快"、"投资小、见效快"的项目。像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问题，在当时看都解决的很好，可到头来都是后患无穷。

宗教信仰是这些民族生命的一部分，不让拜、毋宁死（最近王蒙出了本书《不奴隶、毋宁死》)。外来民族可以占领国土、掠夺财富、焚烧庙宇、屠戮人民，却无法改变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像印度人，曾经容许无数民族统治者君临其上，像入侵印度的有较大影响的游牧民族可举出雅利安人、塞种人、鲜卑人、贵霜人、土耳其人、匈奴人、蒙古人等，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不大在意什么人来统治剥削他们——

无论是本地人或异邦人，因为对他们而言要紧的是宗教而不是政治。古代印度落后挨打，屡被征服却未被同化，而且其文化还在亚洲广大地区内广泛传播而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宗教上的巨大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是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印度人引以骄傲的。甚至那些最强有力的统治者也领略了宗教的力量：像建立孔雀王朝这一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大帝国的旃陀罗笈多皈依了耆那教，孙子阿育王成了佛教圣徒；希腊人国王弥南陀、残暴的游牧民族首领迦腻色伽王最后成了虔诚的佛教信徒；莫卧尔帝国的阿克巴大帝也几乎皈依了印度教。

像今天的西藏问题也是一样。很多牧民发自内心地感谢共产党帮助他们废除了农奴制度，分给了他们土地，给他们办学校、建医院、修"天路"，这些确实都是事实。但他们人生最高的目的是摆脱轮回达到解脱，要紧的是灵魂而非躯体，是无数的来世而非暂驻的今生。因此让他们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背叛没给自己带来任何实惠的宗教领袖，至少在还没有实现"同化藏人"的现阶段还是痴心妄想。对于我们汉人来说，哪怕毛委员只是在瑞金给我们打了一口水井，我们都会吃水不忘挖井人，从此跟着毛主席。但对教徒来说，如果这么要求人家，让他们为了这些眼前利益就背叛自己的宗教信仰，这岂不就是"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权"么？

啰嗦了半天，自己也觉得该收场了。本系列原来想介绍些印度在外交领域尤其是和中国有关的外交事物处理上的一些"大智慧"，看看人家是怎么拿了我们这个谋略王国的冤大头，没想到说起来就没个完，把很多乱七八糟的也扯了进来，一下子写了二十多集，以后也搞点短平快的题目。

总起来说，尽管印度的经济成就引人注目，但它的国内的问题和矛盾也还不少，面临多项挑战，像人口膨胀、环境破坏、贫穷以及种族宗教冲突，另外还有印度独有的种姓问题等等。再者，印度是个联邦制国家，地方邦国权力很大。很多邦国的主体是少数民族，印度二十个邦中，有七个有独立诉求，各个要求独立的邦都有武装力量，分离主义猖獗，零散的恐怖活动无处不在。印度独立以后实行的国策也走了很多弯路：强调计划和国有企业使经济发展缓慢、效率低下，腐败严重等等。

有些问题，眼下阿三还没有解决的办法。像人口膨胀问题，恐怕光靠宣传"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还不行，还要靠"上吊不夺绳，喝药不夺瓶，拼死也要把计划生育搞上去"的强硬手段。而在印度，既没有发达国家那种家庭观念和社会福利保障（在我接触的很多家庭，养孩子不如养只狗已经是共识），还是东方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思想；也不能实行中国这种强制手段，还要受宗教的种种约束，民主的各种限制。

所以，我认为印度成为发达国家还遥遥无期。这类国家，眼下还谈不到什么为人类做出多大贡献，先考虑怎么用不到 3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养活 10 亿多的人口，少给世界找点麻烦就已经不错了。

(全文完)